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61 期  
2010 年 2 月 10 日

\*\*\*\*\*

## 目 录

(苏联民族问题专辑)

### 【书 评】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 雁

### 【论 文】

学术随笔：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

——从读 B.A. 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谈起

潘志平

### 【译 文】

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

Philip G. Roeder 著，王娟 译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sup>1</sup>

金 雁

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以下简称《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二战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科夫是跨苏联和俄罗斯两代的资深民族问题专家，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长，剧变以后曾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什科夫虽曾在“体制内的高位”，却没有沾染上从学者变成政治家的官僚习气，也能始终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拖着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静，他是当今俄罗斯罕有的勇于反思且能够宏观把握俄罗斯民族问题症结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剖析苏联解体后的民族问题大部头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由姜德顺先生2005年开始动手从英文翻译，到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说我们现在拿到手的中文译本距离作者写作时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时俄罗斯国际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叶利钦之后又经历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标也几次变化：从叶利钦的“面向西方”，普里马科夫的兼顾东、南的“欧亚主义”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和普京后期的“新斯拉夫主义”+“强国主义”，但是该书至今读来不但没有过时的感觉，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可以说季什科夫当年对俄罗斯民族问题发展前景定义的“过渡中认同”以及深刻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对后苏联族裔问题的整体把握。

## 苏联早期“实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后果

我们知道，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设计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很大，它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力调整的。1917年11月2日通过的《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具有很强的“革命党”色彩，十月革命前处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各个民族“越乱越好”，在内战阶段因为需要民族主义支持新政权，也唯恐各个民族不“独”、唯恐非俄罗斯民族“缺乏民族自决权”。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特点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赋予自治很大的权力，宪法中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自治实体”。比如在对待乌克兰独立问题上，1917年6月27日列宁说：“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决裂。”正如后来索尔仁尼琴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权力稳固下来，力量足够大了，“民族自决权”就成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时就需要以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俗称《卡拉汉宣言》）中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

<sup>1</sup>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1月22日。

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这些被我们欢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方针也就是听听而已，不能当真，等苏俄的处境稍有改善，它立马就不认账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邦制”（57-58页，所有引文的页码均出自该书中文译本，下同），“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62页）。可以说苏俄早期的民族自决背后掩盖了太多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官方批准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种政治策略，而他们“对真正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仁慈”（68页）。

我们后来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化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这是“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决策变换。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有过成效，但问题是它的“双重性质和矛盾特征的联邦制的荒谬开始让这个苏维埃政府为难”（59页），这种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南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02页）。

这种状况是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的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

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什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

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药”，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

## “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及其族裔和谐之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442页）和“优势族群”心理的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伟大的苏联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如今转轨时期经济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转眼间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444页），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445页）。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竞相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新闻》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的“火气旺盛”（562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

相，它们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的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452-453页）。

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弥漫着“斯大林热”，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念之情。其实只要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的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经历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英《今日历史》2009年10月号），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各族友谊鲜花盛开”（475页），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安全焦虑、安全恐慌。

布热津斯基希望俄罗斯回落到一个类似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下行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而现实当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472页）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它既综合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留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锤子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才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维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新词汇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俄罗斯的伟大之处，以及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要采取政治措施（18页），据社会学调查结果看，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着。

季什科夫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对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所处的理解和尊重，这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内建立内部和谐与自尊的进程（550页），同时，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义——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正在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偏执，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534页），而“新帝国综合征”唯我独尊的成分又会损害周边民族，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如何化解后苏联的族裔紧张关系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对俄罗斯的尊重，尤其应当把对其领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内，横向结合、减少族裔悬殊、加强地方自治、实行立法多元化、强化秩序并控制武器、拓宽和平区、对族裔领导人进行教育、建立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强化族裔和谐的国际因素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现今的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界的确出了毛病，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错了’”（554页），如今大多数人仍“淹没在肤浅的、火力旺盛的”以“炽热头脑”形成的潮流中（562页）。他告诫知识界说，当事者迷的非理性冲动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假如学者和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555页）和“俄罗斯式的‘命定说’的陈旧的傲慢”，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俄罗斯“新帝国”的梦想也会破灭。

## 【论 文】

# 学术随笔：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

——从读 B·A·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谈起

潘志平

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家 B·A·季什科夫，早已为我国学界所熟知。他的《民族政治学论集》由高永久、韩莉译成中文，2008 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季什科夫在出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民族事务部长的同时，又曾兼职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政界与学术界的“双重”的最高级身份，显示他在俄罗斯民族事务管理和研究的权威地位。《民族政治学论集》汇集了作者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未刊布的报告和文章，按章节编排有序，大体完整和系统地体现作者对俄罗斯联邦制命运和民族国家体制等问题的认真思考。论集所辑论文写作于 1989 年至 2001 年之间，这正是俄罗斯面对“苏联解体”后最艰难的时期。苏联解体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民族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季什科夫的思考，就凭其民族工作方面的“双重”的最高级身份，当然引人瞩目。

《民族政治学论集》内涵丰富，在这篇学术随笔中不能面面俱到地评论，只想结合我国的实际，从一个角度谈起，即从关于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问题展开讨论，具体说从“民族与身份证”问题切入。

## 我是谁？

1997 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六年后，俄罗斯联邦在发放新的身份证中正式删除了“民族成分”一栏。季什科夫就此写道：

“如果有人问我，近几十年来俄罗斯国家政策领域发生了什么最有意义的事件，那么我会回答，开始发放新的公民身份证。我国最终废除了 1934 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

“只有庸俗的人才认为：一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成分，和人出生时有鼻子、眼睛和耳朵一样，民族成分是一个人的基本标志……”

“一个人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数个民族，属于一种文化或者数种文化，是他的个人行为，具有可变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国籍问题上有自决权，国家对公民有义务，而公民，除权利外，对国家也有义务，这种关系是由法律和其他标准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属于哪一个民族由他自己决定”。<sup>1</sup>

我想，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念到这里不免要纳闷：一个人的族属怎么可以有“数个”，还“具有可变性”、怎么是完全与国家无关的个人私事？其实，这就是我们和原苏联共有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种思维，即如季什科夫所说：

“每一个公民，必须按某一个双亲的民族成分，填写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并且事后无权更改……”

“苏联对民族的理解，不仅以血亲原则为基础，而且坚信每一个人应当有民族成分，且只有一个。……过去我国公民在领取身份证时必须按国家要求填写自己的民族（常常是

<sup>1</sup> [俄罗斯] B. A. 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M]，高永久、韩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7~72.

父母或民警替他们填写)成分”。<sup>1</sup>

如果走出国门,可以发现,只有我国同前苏联拥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思维,如果站在他国角度上来看,我们的这种思维倒是怪怪的。原苏联身份证栏目依次为名姓、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民族,“民族”在“第五栏”。1997年季什科夫们欢呼的是:俄罗斯最终和“第五栏”说再见。我们中国身份证栏目依次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住址,“民族”赫然列在“第三栏”。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这种“民族”思维,也只是最近三十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强化起来的。在三十年前,我们还没有身份证,但人们要不断地填写各种表格,那时“第三栏”倒不是“民族”,而是“家庭出身”,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出身”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拥有者的政治地位,涉及到升学、入党、参军、提干等等。当我们告别了“阶级斗争”也就是和“家庭出身”说再见之时,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因为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删除此栏目,当初似乎也没有人出来欢呼,“家庭出身”栏目就这样在人间蒸发。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民族成分”取代了“家庭出身”占据了这“第三栏”。

这“第三栏”对于每一个中国公民而言,重要、也不重要。说它不重要,是我们在许多不重要的场合也都需要填报:去医院看病,上图书馆借书,进某机关大门登记,等等,随手填之,非常无聊。说它重要,它又确实非常重要:高考有无加分,计划生育是一胎还是二二胎,升职有无位置等等,非常严肃。“民族成分”一旦确定,绝对不可更改,不信你可试一下。2009年重庆有官员为子女升学加分偷改孩子的这一栏,闹出轰动全国的一大丑闻,但如果站在国外的视角来看,那简直就是怪闻!再比如,某人的父母分别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在出生时父母给他填报了“哈萨克族”,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专家,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都以他为自己民族的骄傲。但某天,该单位副厅长之职有一维吾尔族空缺,某人就没有资格去补这个缺。某人不禁要问:我是谁?

本人最近还不断遭遇到填表格时需要填写无聊的“民族成分”一栏,我想空下这栏不填,比如在“政治面目”可有“无党派”,“民族成分”这一栏能不能有“无族属”?或者就填“中华民族”或“华族”?好象还不行。

近日查找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已成民族斗争废墟的前南斯拉夫,在当年人口民族统计还真有不少人既不申报塞尔维亚族,也不申报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等,而是填报“南斯拉夫人”,这些“南斯拉夫人”所占比例还不小,但已有一定规模:

1961年	317124	1.71%
1971年	273077	1.33%
1981年	1219045	5.44%
1991年	1331782	5.57% <sup>2</sup>

问题是,20年前的这133万“南斯拉夫人”,现在又是谁?

## 政治化与文化化

当然,这些还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近三十年,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营造了一个非常浓厚的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氛围,或者说,我们已陷入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境。

为此,十多年前,我们先后完成两项国家课题《中亚政局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新疆的稳定》、《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及民族理论的当代思考》,最终形成一部专著《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我们的基本认识:“从理论上讲,国家与民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社会历史范畴。国家的本质是政权,而民族则是人们的共同体,它是基于共同经济生活为基础、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两者混淆的结

<sup>1</sup> [俄罗斯]B. A. 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M],高永久、韩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7~68

<sup>2</sup> 民族译丛.1992[2]78



果，不是政治问题民族化，就是民族问题政治化，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sup>1</sup>

我们据此提出这样一个命题：“防止民族问题政治化，关系政局稳定，十分重要”<sup>2</sup>，具体地说：“使民族问题不得政治化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对于当前反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具有战略意义。不使文化现象政治化，不使文化多元变成政治多元，是有价值的政策取向：一，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切忌把什么问题都扯到民族和民族关系上去；二，适度淡化一些突出民族意识的‘包装’，强化表现各民族共有的祖国意识；三，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培养各族民众的爱国之心，使各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以国家意识取代族群口号；四，理论研究、大众媒体和文艺创作要顺应国际区分淡化和民族心理距离缩小的大趋势，促进多民族杂居地区的社会融合，即社会的文化整合”。

3

哈萨克斯坦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瑟罗耶日金对此的评价是：“这个方法很现实，因为它将民族置于政治范畴之外，使民族分离主义失去了自身的基础”。<sup>4</sup>

2000年以来，马戎教授写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文化化”或“去政治化”文章，我比较赞同他的看法：“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力图把民族问题‘文化化’，而我们却遵循着西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把民族问题政治化，这里的错位现象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维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单地拿过来，把我国的一般的民族问题‘政治化’”。<sup>5</sup>

按我的理解，对于如此复杂的民族问题，除了有政治解决的安排和办法之外，还可以有更多的文化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然而，相反的意见很多，特别在“族群”的概念，在“去政治化”或“文化化”与“政治化”的主张上，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的。批马戎的文章很多，观点意见大同小异，就不多说了。但其中，陈建樾斥责马戎教授“是误导学术和以学术‘绑架’政治问题”，言词就重了。陈先生最核心理念是：“民族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sup>6</sup>，可惜的是，这条重要理论根据仅抄自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词条，还是1986年版，以百科辞书的某句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本，仿佛还是个未入道的本科生。其实，民族问题，既包括自身发展问题，更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日本学者宇多文雄说：“所谓民族问题，并不能用通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分类法去分类。民族问题是所有这些缠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引发民族问题。”<sup>7</sup>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民族问题依然复杂，民族工作的任务繁重”，江泽民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有大段论述：“一是各民族政治上平等实现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的遗毒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五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尤其

<sup>1</sup> 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6~7.

<sup>2</sup> 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274.

<sup>3</sup> 潘志平，稳定新疆六点（国家社科基金1994年度项目“中亚政局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新疆的稳定”研究报告摘要）[J]. 中亚要论. 1997.2.20

<sup>4</sup> К.Л.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M]. Алматы. 2003,с.188

<sup>5</sup> 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 2000[4]

<sup>6</sup>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J]. 世界民族. 2005[5]

<sup>7</sup> 宇多文雄，关于‘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J]. 民族译丛. 1994[1]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sup>1</sup>

上述所举的这些问题中有政治问题，甚至是如分裂那样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但也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江泽民代表中央提出的处理的基本方针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sup>2</sup> 事隔两年，1994年，江泽民在《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的两件大事》更明确指出：“由于利益关系、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在交往中也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纠纷和摩擦，对于这些人民内部矛盾，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要都拉到民族问题上去”。<sup>3</sup>

请注意，前段话还认为民族问题包含有权益、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方面产生的矛盾、误会和纠纷，而后段话却主张“利益关系、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产生的纠纷和摩擦“不要都拉到民族问题上去”，貌似矛盾，其实不然，从“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到“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要都拉到民族问题上去”，是不是就包涵有“文化化”处理的愿景和策略？这就是政治家的政治。而学者则是这样建议的：

在所谓“民族问题”的范围内，包含着广泛复杂的问题，企图用一种理论和政策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多数复杂的问题可以还原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因此应该开辟解决这些个别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如果多少能解决的话，就会减少怨恨、憎恶等负面的民族感情趋向表面化的东西。本来“民族问题”是不可能全部解决的，但所谓“民族感情”这种不得要领的东西，其震力的范围是可以缩小的。

有论者以为，“政治化”与“文化化”是受制于国家类型，传统多民族国家在政策上倾向于“政治化”，而移民国家则倾向于“文化化”。<sup>4</sup> 此说未安。民族问题中有政治问题，比如民族平等问题，须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民族区域制度的安排，对少数民族作为弱势群体的“优惠”、“照顾”，等等——解决。这种制度性安排是必要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这种安排不仅在我们这样的“传统多民族国家”中有，在美国那样的“移民国家”也有。比如美国政府自1961年起推行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就是一种特别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以缓和种族矛盾，尽管有“逆向歧视”的抗议，但为了社会和谐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问题之一是：要掌握“度”，不要因为这种安排，弄得两边都不讨好。现在比较关注的“两少一宽”政策，就是突出的一例证。所谓“两少一宽”是中发（1984）第五号文件的规定：“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有评论说得好：“从法理上来说，‘两少一宽’显然在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根本原则：凭什么两个人触犯同样刑律，因民族归属不同就可以一抓一放？‘两少一宽’优惠的对象是极少数刑事罪犯，而不是罪犯所伤害的广大良善百姓。没有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会有这样明文规定的法律。”<sup>5</sup> 问题之二是“政治化”的这个“化”，就有把本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或被政治纠缠的文化问题，统统“化”成政治问题处理，难道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没错，但是再好的政策也有个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完善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就一再强调要坚持完善我们的民族区域制度，问题是要弄清“坚持”什么？“完善”什么？总不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无所作为。记得前南斯拉夫解体前夕，日本学者柴宜弘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后认为：“可以说，他们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公正的”，但是他同时预言：“南斯拉夫也许很快就会瓦解”。<sup>6</sup> 这一预言不幸被言中。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前南斯拉夫的废墟中不断发生了大规模种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惨案。由此，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被认为“非常公正”地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前南斯拉夫何以解体于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之中？答案很简单：民族

<sup>1</sup>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1~182.

<sup>2</sup>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9..

<sup>3</sup>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6

<sup>4</sup> 毕跃光，国家类型与民族问题的解决[J]. 世界民族.2009[4]

<sup>5</sup> 林达，司法不公是新疆问题引爆点[J]. [香港]亚洲周刊.2009[30]. 2009.7

<sup>6</sup> 柴宜弘，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J]. 民族译丛.1991[6]

问题高度政治化最终埋葬了它。

## “同化”的帽子！

现在还是回到“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这个议题。在陈建樾先生眼里最不可容忍的，是企图“以公民身份淡化民族身份”。但在我眼里最难以接受的是：强化民族意识，以致在某些人那里民族身份甚至于高于公民身份。最近十多年来，本人参加过许多国内的和国际学术会议，由于来自新疆就经常要面对这样的提问：新疆问题究竟是什么，还要求我简短地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回答是：新疆问题非常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怎么说呢？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在新疆已营造出“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浓厚氛围。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动手打起来，一个人把一个打伤了，甚至一个人把一个打死，在比较单一的汉人地区，很简单，那分别是团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刑事犯罪问题、严重的刑事犯罪问题。然而，在新疆就复杂了：人们首先要问这两个人是什么民族，如果两人都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那就分别是团结、社会治安、刑事犯罪、严重的刑事犯罪问题；如果这两个人分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那立即就有很多人质问，这是不是民族问题？是不是一个民族压迫欺侮一个民族？这样就一般问题民族问题化，并高度政治化。在这里狭隘封闭排它的“民族意识”起着极恶劣的作用。如日本学者宇多文雄所指出的：

“民族是一种归属意识，是在与其他集团对比基础上具有原初意义的一意识。它往往是一种气缺乏客观根据的感情的东西，因此在不同情况下，具有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

对于人来说，民族归属意识的确很重要的。为了这一点，不仅可以豁出性命，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杀害很多邻人”。<sup>1</sup>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人们都在问为什么？韶关“6·26”事件本来仅是一起恶性治安问题，当传到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后为什么就变味了，在这种“高度政治化”氛围下，经过别有用心心的处理、发酵和煽动，血腥的“7·5”事件就这样制造出来。这就是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恶果，而我们主要面对的就是，最近三十年来有意无意地通过强化“民族意识”，营造出的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氛围。可以说，将“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正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稳定的基本套路。

“7.5事件”发生后，我接受了诸多媒体的采访，本人反复地如是说。2009年7月21日，我在新华社新疆分社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的采访，又反复谈了这些认识，并且谈了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以及俄罗斯联邦1997年在身份证上删除民族成分这一栏。韩咏红在2009年7月30日的一篇报道中以“一些学者谈应淡化民族界定”为题写道：“新疆社科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在乌鲁木齐受访时说：‘至少不用每次填表格，都要填民族，不断地重复灌输民族意识。维族的民族意识原来没有那么强，都是我们自己给灌出来的’”。<sup>2</sup>看来我一下子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当天，德国广播协会（ARD）驻上海记者处记者舒欣（Astrid Freyisen）和钱峰就从上海来电话联系要求采访。8月3日，在新华社新疆分社接受了这两位德国记者的采访，期间他们主要提了三个问题，兹将采访本人的摘要录之如下。

记者问：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否要做重大改变？

潘答：没有，至少我不知道要做什么重大改变，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

记者问：潘教授，你是不是向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以后不用在填表格时填写民族？

<sup>1</sup> 宇多文雄，关于‘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J].民族译丛.1994[1]

<sup>2</sup> 韩咏红，移民是否冲击新疆经济？[J][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7.30

潘答：我不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怎样报道的（当时我还没有看到那篇报道），我向新加坡记者主要介绍的是俄国的情况，1997年俄罗斯已在新发放的身份证上删去民族成分那一栏。作为学者，可以向政府提建议，但仅仅是建议而已。

记者问：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是不是要同化少数民族？

潘答：好严肃的问题！（面向 Astrid Freyeisen）您应是地道的德国人，我想请您出示一下您的德国身份证和护照，上面有无民族或种族这一栏，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是犹太人？

Astrid Freyeisen 回答说：没有民族这一栏。

潘问：如果你们国家政府在表格中一定要你们填写这一栏，可不可以，那将是什么问题？

Astrid Freyeisen 回答说：不可以的，如果政府这样做的话，那就有种族歧视之嫌疑。

潘说：那不就行了！你们德国、英国、美国都是如此，怎么我就说了说俄国现在也这样做了，就有这么一顶“同化”的帽子在这儿等着呢？

俄国在身份证删去民族这一栏，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不可避免地遭到国内的一些政治家“取消民族”的指责。季什科夫是这样的回应：“为什么现在一些政治家主张保留俄罗斯身份证上‘民族’一栏呢？如果不是被国家的民族主义病毒感染的话，那么在这里，更准确地说，与其说是在身份证上标明‘民族’的习惯在起作用，不如说是现代政治企图在起作用。无论是以俄罗斯民族的名义，还是以非俄罗斯民族的名义，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已经发展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包括新法西斯主义和武装分离主义，日常生活中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sup>1</sup>

## титуль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和 political correctness

1990年苏联解体的前夕，两位著名的民族学家Ю·В·布朗利和С·В·切什科就修改苏联宪法提供的意见中列出“迫在眉睫的任务”的第6条为：“取消个证件中以及涉及公民个人公务和其他证件中有关公民民族籍的记载。”<sup>2</sup> 1993年苏联已解体，又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В·П·科兹洛夫撰文反思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立主义，他写到：

“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中也包含一些严重的消极因素和潜能，……应当把视线集中在民族分立主义的发展因素上更为详细地加以讨论。让我们从这一点开始，……原则上与保证全体苏联公民个人平等权利不相容的，因为他们境内的异民族集团不可能妄想得到比如说在关于国家机关‘土著化’决议中反映出来的那些‘命名民族’（титуль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的优越地位。……‘命名’民族的特权还扩大到了相关构成体境外，其中包括保证让那些想入学的人不通过考试就进入中央高等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身份证制度和带有民族栏目的职务调查表就开始为这种实践服务。……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保证不以民族（以及语言、宗教和种族）属性不转移的公民的平等权利。由这一基本原理可以得出一些可能实现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在护照和其他个人证件或职务调查表中禁止记录民族属性，以便在允许考虑人口调查中的这种属性的条件下，这一点不可能被干部、国库以及其他目的所利用（指出这一点是适当的，即在德国，显示民族属性要受到法律的惩罚）”。<sup>3</sup>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титуль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可对译为“命名民族”，即以其族名作为某个民族构成体（共和国、自治州）冠名的民族。当今世界，也就是前苏联和今天的俄国在内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前南斯拉夫和我们中国，在实行民族联邦或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地方自治构成体以“主体”民族冠名。这样的冠名自然有当时安排的实际背景和理由，但它有可能起的负面作用是：为狭隘、封闭、排它的民族意识预留了发展的空间，如：“××（地方）是××人的”之类的

<sup>1</sup> [俄罗斯] В. А. 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M]，高永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2~73

<sup>2</sup> Ю. В. 布朗利、С. В. 切什科，当前民族过程——关于苏联新宪法的讨论[J]. 苏联民族学. 1990[5]. 民族译丛. 1991[6]

<sup>3</sup> В. П. 科兹洛夫，民族主义、民族分立主义与俄罗斯人问题[J]. [俄罗斯]祖国历史. 1993[2]. 民族译丛. 1994[4]

思想和口号，对此应有认真的估计。

美国没有民族问题，但有种族问题。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问题曾相当严重，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不能根本解决，但已缓和多了。李慎之先生在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指出：“在几百年特别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译就是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要做一个政治正确的人必须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约定成俗，越严越好。……只知道一不留神就会犯规出错，招人鄙视（以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为你冒犯了他）”。<sup>1</sup>

这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太重要了，学者、各级官员直至总统都要受其规范，否则，是学者就可能因此失业，是官员，就可能是丢官罢职。2009年7月16日，发生了黑人教授盖茨被捕事件。7月22日，奥巴马总统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轻率地就以为可能是种族问题，批评那位执法的白人警察“愚蠢”，将一件普通的警察执法之事拉到种族问题上，这就犯了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错误。那位小小警察不买账向总统叫板，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贵为总统的奥巴马不得不低头认错，请白人警察和黑人教授喝啤酒而化解了一场政治灾难。

political correctness 应是规范文明社会的一种积极精神。如果我们也培养一种有中国特色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精神，类似狭隘、封闭、排它的民族意识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环境，社会是不是会少一些无谓的冲突和摩擦？美国学者菲利克斯说：“不同民族、种族、宗教集团，如何能够和睦而比邻相处——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一个看似简单、但却从来没有解决的古老却又非常现代的问题”。<sup>2</sup> 我们正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此特别声明，本人并非鼓吹在立即从现行身份证中删除民族栏，这可能还是一件从长计议的事，目前，只是提请讨论研究一下，如何从淡化民族意识，清除狭隘、封闭、排它的民族意识着手，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境。

（作者：潘志平（1945～）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石河子大学特聘教授）

---

## 【提示】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至第61期均可以在《中国民族宗教网》查阅，  
步骤： 百度—中国民族宗教网—理论—理论搜索—学术通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马戎发表有关民族研究的论文可在《中国民族宗教网》查阅，  
步骤： 百度—马戎—马戎专栏《中国民族宗教网》—本网独家。

---

<sup>1</sup>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J]. 太平洋学报.1997[2]

<sup>2</sup> 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译，公民与国家[M]. 导言5页，新华出版社，.2002

【译 文】

## 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sup>(1)(2)(3)</sup>

菲利普·罗德 (Philip G. Roeder)

王 娟 译

苏维埃发展战略 (Soviet developmental strategy) 的核心要素之一, 就是它创造了一套政治制度, 这套制度保证了其政权可以对与现代化相关的社会动员的全过程进行控制。这一战略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它所提供的重要的度量指标显示,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苏维埃政权曾拥有良好的族际关系。然而, 在苏维埃政权确立 70 年之后, 正当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进展良好之际, 这一发展战略却引发了分裂性和破坏性的族群政治 (ethnopolitics)。

苏维埃发展战略看起来完全不同于西方所熟悉的发展模式。正如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所言, “工业主义兴起的时代” 同时也是 “民族主义的时代”<sup>1</sup>。但是, 苏维埃战略使 “民族主义的时代” 这一政治结局延迟至工业化进程的相当晚的阶段才发生。就短期来看, 这是明智之举, 因为它避免了使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同时应付各种危机: 苏维埃政权在建立权力基础和发动经济改革之初, 并未面临认同危机<sup>2</sup>。然而, 这一战略本身却包含了在长期具有反功能的祸根, 并在过去的 35 年间导致了新的族群自决意识 (ethnic assertiveness) 和抗议行动的兴起。<sup>3</sup>

在另一个方面, 西方关于边缘民族主义 (peripheral nationalism) 的经验与苏联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在西方, 无论引发边缘民族主义的宏观经济条件如何, 它总是由一些处于劣势的族群宣称的。根据 Joseph Rudolph 和 Robert Thompson 的观点, 在 19 世纪的西欧, “最常引发自治主张的因素” 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族群日益严重地在 “它们所属的国家体系中被排斥和剥削”。<sup>4</sup> 通过对最近发生于经济繁荣时期的边缘民族主义的研究, Peter Gourevitch 发现, 最可能支持族群政治运动的人, 正是那些被新资源带来的机会和期望所鼓动的弱势族群。<sup>5</sup>

在苏联, 族群政治最蓬勃的地区是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正是在那里, 地方领袖们为改革颁布了最野心勃勃的立法安排 (见表 1), 公民们发动了最大规模和最频繁的游行示威活动 (见表 2)。然而, 如图 1 所示, 这些民族 (尤其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爱沙尼亚人) 正是在教育和职业方面最获成功的族群。许多时候, 这些民族的入学率和就业率甚至高于数量上占多数的俄罗斯族人口。甚至在入党问题上, 格鲁吉亚成年人中的党员比例也远高于俄罗斯的这一比例, 而亚美尼亚的这一比例则高于所有民族的平均水平。近些年来, 这类政治运动很少是由那些处于劣势的族群发起的, 例如那些地处中亚的族群。因此, 推动最具野心的变革计划和发动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 恰恰是那些拥有最高水平的教育、就业、甚至政治参与权利的族群, 而非那些处于劣势的、边缘化的族群。

这种新型的苏维埃族群政治, 型塑于拥有名义自治权的族群区域 (ethnic homelands) 这样一种联邦政治体制。苏维埃政体的设计者们认为, 统一的军队 (organizational weapons)、政治企业

<sup>(1)</sup> 原文为英文, 标题为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刊于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pp.196-232。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sup>(2)</sup> 原文中的致谢、声明、资料来源、参考文献等皆采取脚注形式, 列于每页下端, 本译文以<sup>123</sup>的格式对原文脚注处进行了标注, 序号与原文相同, 但未将参考文献列于页下, 如需了解, 请于原文中查询。译文中以<sup>(1)(2)(3)</sup>的格式标出、以脚注形式做出的对部分词语的解释 (如本条脚注), 皆为译者所注。

<sup>(3)</sup> 原文中有部分词语采用了斜体字, 译文中对应词语亦采用了斜体字。原文中有部分词语首字母大写, 译文中对应词语采用了粗体。

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和动员性资源（mobilizational resources）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他们逐渐取得自信，即联邦制度能够扩展其对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控制能力。这样一种政体在每个族群区域内创制了一个由党政官员构成的干部团体（cadre）。这些官员选自当地族群内部，但其职位是由莫斯科任命的。当这一干部团体在族群共同体内被赋予运用动员性资源的垄断权后，它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可以动员该族群采取行动。这种战略在取得族际和平的同时并未根除产生族际矛盾的根源，即没有铲除族群独立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机会。

表 1 主要加盟共和国关于族群关系问题的立法  
（1985 年 9 月 1 日——1989 年 12 月 31 日）

共和国	主权 <sup>a</sup>	语言 <sup>b</sup>	其他法规 <sup>c</sup>
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11/16/88）	法律（1/18/89）	共和国经济责任(5/18/89) 获得选举资格所必需的居住时间（8/8/89） <sup>d</sup> 获取被选举资格所必需的居住时间（11/17/89）
立陶宛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5/18/89） <sup>d</sup>	法律（11/18/88） 常委会法令(1/26/89) 最高苏维埃法令(5/18/89)	共和国经济独立(5/18/89) 公民权法（11/3/89） <sup>d</sup> 兵役法（9/29/89） <sup>d</sup>
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7/29/89） <sup>d</sup>	最高苏维埃决议(10/6/88) 法律（5/5/89）	移民限制（2/14/89） 获得选举资格所必需的居住时间(7/29/89) <sup>d</sup>
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9/23/89） <sup>d</sup>	73 号法规 <sup>e</sup>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11/19/89）	75 号法规 <sup>e</sup>	
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		73 号法规 <sup>e</sup>	合并纳卡地区（12/1/89）
塔吉克加盟共和国		法律（7/22/89）	
摩尔多瓦加盟共和国		法律（9/1/89）	
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10/21/89）	

来源：Izvestiia, January 20, 1989, July 23, 1989, November 5, 1989, November 13, 1989, November 20, 1989; Kommunist [Erevan], December 3, 1989; Pravda, October 7, 1988, November 28, 1988, May 6, 1989, May 20, 1989, July 30, 1989, August 10, 1989, August 17, 1989, September 1, 1989, September 3, 1989, October 6, 1989; Sovetskaia Estoniia, November 19, 1988; Sovetskaia Litva, November 19, 1988, January 27, 1989; Sovetskaia Latvii, February 17, 1989.

- a 宣告拥有主权和废除联邦法律的权利。括号内为实施日期。
- b 宣告设定国家语言。括号内为实施日期。
- c 先前根据 1978 年加盟共和国宪法而实施的语言条款。
- d 部分内容随后被全联盟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宣布为违宪。
- e 括号内为实施日期。

因此，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当国家实现了向工业主义的转变后，这种联邦制度和地方干部团体却都变成成为新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工具。被设计用来扩展莫斯科对各族群的控制力的各项制度（在西方，这些制度总体上被认为不利于保护各族群的权利），都具有了新的使命。自治地方（autonomous homelands）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对族群共同体进行集体动员，因此，正是联邦制度和地方干部团体共同塑造了与族群问题相关的议程。

根据我们的观察，苏联问题的核心是一种不断扩展且越来越具有公共性的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学。这并不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引发的新现象，而是一个从尼基塔·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就开始显现的连续趋势。正如下面的例子将要展示的，扩大自治权的要求、针对语言政策的抗议活动、限制俄罗斯移民的呼吁，以及各族群共同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后的各个时期就逐渐浮出水面。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显然不足以解释在他上台及他发动改革之前就发生的这一趋势。

表 2 主要的和平示威次数  
(1985 年 9 月 1 日——1989 年 8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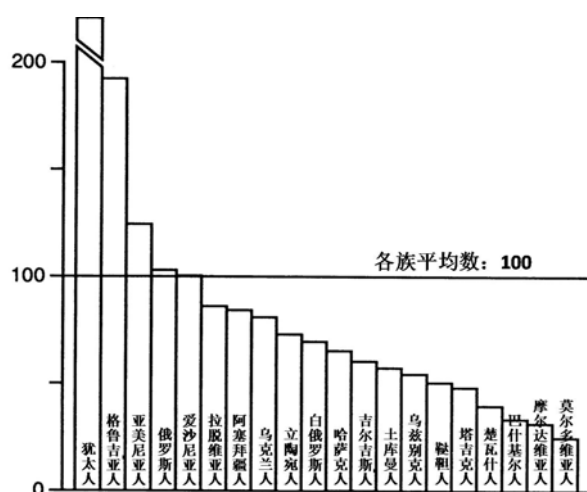
族群	估计的示威人数	
	参加者超过 100,000 人 <sup>a</sup>	参加者超过 10,000 人
亚美尼亚人	25	30
阿塞拜疆人	9	19
立陶宛人	4	9
拉脱维亚人	3	7
格鲁吉亚人	2	4
爱沙尼亚人	2	4
摩尔达维亚人	1	6
乌兹别克人	1	1
“飞地”俄罗斯人	0	3
白俄罗斯人	0	1
乌克兰人	0	0
哈萨克人	0	0
吉尔吉斯人	0	0
塔吉克人	0	0
土库曼人	0	0

来源: *New York Times*;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eport on the USSR*.

a 包括参加者超过 100,000 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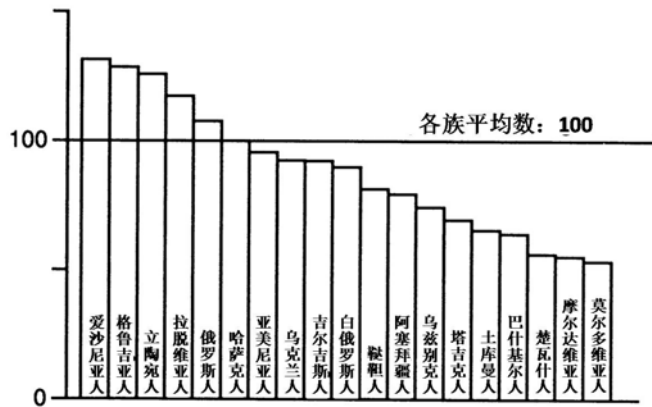
苏联的族群危机引出了三个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存在于创造了那些民族区域和地方干部的苏维埃发展战略之中。首先，**起源** (*origins*): 为什么在工业化转型时期有助于族际和平的制度后来却变成抗议活动的助推器? 其次，**范围** (*incidence*): 为什么那些相对占优势族群的反对声音最大，而那些在各项可比较的社会经济、政治指标上处于劣势的族群反而相对沉默? 第三，**议程** (*agendas*): 为什么在中央族群和外围族群的争执中，最重要的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苏联发展战略的细节问题，尤其是联邦政治。正如结论部分所指明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清楚地表明，**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族群问题的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图 1 各族群的教育获得、职业发展和政治成就<sup>a</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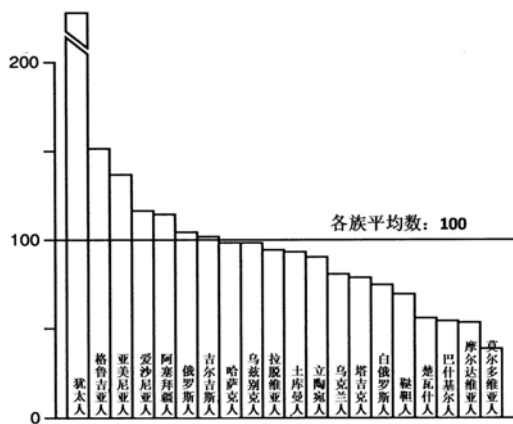


(a) 1970年各族群高等教育完成情况  
(占10岁以上年龄组人口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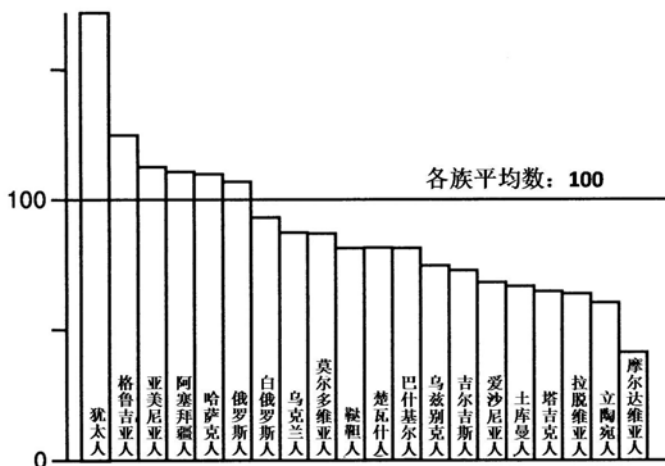




(b) 1970年各族群高等教育入学情况  
(占17-29岁年龄组人口的比例)



(c) 1975年各族群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专业人员情况  
(占25-29岁年龄组人口的比例)



(d) 1975年各族群党员情况  
(占20岁以上年龄组人口的比例)

来源: Tsentral'noe Statisticheskoe Upravlenie, *Itogi vsesoiuznoi perepisi naseleniia 1970 goda* (Moscow: Statistika, 1972-73), 2: 12-75, 4: 360-82, 393-433; *Narodnoe obrazovanie, nauka, i kul'tura v SSSR* (Moscow: Statistika, 1971), 196; *Narodnoe obrazovanie, nauka, i kul'tura v SSSR* (Moscow: Statistika, 1977), 296; *Partiinaia zhizn'*, No. 10 (1976), 16.

a 对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族群, 这些图形展示了最新的可获得数据。

## 苏维埃发展战略与族群问题

(The Sovie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thnicity)

政治企业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s)<sup>4)</sup> 在动员抗议活动、政治化族群问题、甚至创造族群认同等许多问题上都扮演了关键性角色。<sup>6</sup> 例如, 根据欧洲的经验, 那些认为现状抑制了他们追求精英地位之抱负的地方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族群复兴运动的先锋。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 称, 这些知识分子寻求创立一种独立的、以族群区分 (ethnically distinct) 的分层体系, 根据这一体系, “各专业团体和行政机构能够自然地满足当前数目众多的、被排斥的证书持有者的职业愿望。”<sup>7</sup> 这些地方取向的知识分子是边缘地区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在族群共同体中, 政治企业家拥有两种动员策略: **原发性的 (primordial)** 和 **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原发性策略重点关注族群复兴——用史密斯的话说, 就是“通过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而获得的社区重生 (communal regeneration)”。<sup>8</sup> 这种以发动政治行动为目标的族群共同体动员通常是围绕着族群身份的确认而展开的, 往往与其它一些议题相结合, 如文化、认同、信仰, 以及如何针对同化性政策对族群身份所造成的威胁做出反应等。工具性策略则重点关注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获取。正如Rothchild所言, 族群动员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性的、新型的利益诉求方式”。<sup>9</sup> 用Nathan Glazer和Daniel Moynihan的话来说, 族群本身就是“由利益来定义的, 就像一个利益集团 (interest group)”。<sup>10</sup> 政治企业家也可能混合使用这些策略。

苏维埃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如下方式来实现对族群政治的控制: 首先, 它剥夺了除官方认可的政治企业家以外的其他人对共同体进行动员的权利; 其次, 它阻止了这些政治企业家追求除与计划实施和社会转型相关的政权工具性策略以外的其他利益。苏维埃战略通过三重政策实现了这种控制: (1) 在每个族群区域内建立一个当地的干部团体 (an indigenous cadre), 并赋予这一干部团体垄断本地动员资源的权力; (2) 创立一套激励机制, 用来约束这些新干部的行为, 阻止他们表达任何未经批准的、尤其是与原发性族群动员策略相关的议程; (3) 由这些地方干部负责在官方机构中创制一套以族群为区分的分层体系, 并阻止来自官方机构之外的族群企业家 (ethnic entrepreneurs) 的出现。让我们逐一审查这三重政策。

### 建立族群干部队伍 (Creating an Ethnic Cadre)

苏联将其“民族政策”的结构性基础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联邦制 (socialist federalism) 和当地民族化 (indigenization, *korenizatsiia*)。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的表述, 社会主义者联邦“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联邦”, 因为前者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形式……, 是建立在民族-区域 (national-territorial) 的原则之上的”。<sup>11</sup> 因此, 目前苏联的 53 个地方管理机构都是以标明的族群区域 (designated ethnic homelands) 为基础建立的——15 个加盟共和国, 20 个自治共和国, 8 个自治州, 以及 10 个自治区 (*okrugs*)。<sup>12</sup> 当地民族化则力图通过将民族干部吸收到党和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政治、行政职位上来, 以把少数族群与整个苏维埃政治体制联结起来。1920 年,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解释说, 为了使苏维埃的权力接近并亲近少数族群, 需要:

所有边疆地区的苏维埃机关……要尽可能地从熟悉当地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习惯、风俗和语言的本地人中选拔干部; (并且) 所有当地人民中的最优秀分子都应该被吸进

<sup>4)</sup> (译注) entrepreneur 一词原本用于商业领域, 通常译为“企业家”, 指称那些在商业竞争中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以区别于那种纯粹执行岗位角色的“职业经理人”。这一用法引入政治领域, 则指称那些在政治竞争中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以区别于那种纯粹执行公务的“政府公务员”。“政治企业家”通过为非组织化的大众提供公共产品, 来换取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个人收益, 这些收益包括选民支持、公众认同、个人声望等, 它们都将成为其进行政治竞争的重要资源。本文中, “政治企业家”包括各民族区域的地方干部和意欲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各派精英。

<sup>12</sup> (原文脚注) 1989 年 10 月, 雅库塔 (Yakutia) 的 Even-Batagai 区成为了一个新的 (第 11 个) 自治区。

这些机构中。<sup>13</sup>

联邦制和**当地民族化**是以牺牲经济理性和族群融合为代价的。民族-区域原则并不总能导致建立最优化的管理单元。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中，这一原则维持了或强化了本该逐渐消失的族群差异。在乌克兰的问题上，Alexander Motyl会问，“为什么……苏联政府要通过追求**当地民族化**而阻止**小俄罗斯化**（Little Russianization）[比如，同化（assimilation）]？”<sup>14</sup>答案就在于苏联的政治体制把牵制族群政治的动员资源作为了第一要务，并在这一战略中赋予了族群干部以关键性角色。

这些政策为那些代表着非俄罗斯人口的 93%的诸族群提供了在形式上自治的区域（formally autonomous homelands）内根据族群区分来选拔政治精英的机会。Grey Hodnett的大量资料显示，至后斯大林时代初期（1955-1972年），在全部 14 个非俄罗斯共和国中的 11 个当中，在共和国一级的党、政管理职位中，**当地民族化**都导致了命名民族的超比例代表（proportionate overrepresentation of the titular nationality）。至 1980 年代，**当地民族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那些最可见的职位（如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常委会和部长会议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科学协会主席、主要大学的校长，以及贸易联盟委员会主席）之外的职位。由Ellen Jones和Fred W. Grupp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显示，它同样深入到如国内安全这样一些敏感但并不显眼的领域，包括各共和国的内部事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党的行政机关（the Party's Administrative Organs Department）。它同样触及到基层管理职位。例如，1988年，在每一个有自治州的加盟共和国中，当地民族占据州党委第一书记职位的比例都超过其人口占整个共和国人口的比例。<sup>15</sup>

地方干部团体对族群身份的公共表达具有制度性垄断权，即它有权决定用于区分不同民族的族群标志（ethnic markers）。随后，这些族群标志就成为以国家文化形式存在的、在社会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信息沟通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为将大众整合进现代管理体制而进行的政治宣传的核心。对许多经历过社会动员的苏联公民而言，他们与本族群悠久传统的最持久的联系是以苏维埃国家的形式存在的。在最极端的情形下，由这些地方精英所识别的族群标志又定义出了新的族群，例如塔吉克族，而这一新族群在此前并不是一个被精英和民众认同的政治共同体。然而，随着近期塔吉克政治反抗运动的发展，即使这样的族群标志也成为对民众的政治行动进行动员的基础。<sup>16</sup>

更重要的是，在各共和国内部，这些地方干部被赋予了守门人的角色，他们负责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对族群进行政治性动员。在本地成员可接触的范围之内，这些干部垄断了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必需的动员资源。沟通方式——尤其是以本民族语言出版或广播的媒体——都是被由这些干部控制的国家机关所垄断的。<sup>17</sup>集会场所——如共和国的报告厅或公共广场——的使用权也是由这些干部决定的。并且，只有经由这些干部批准，公共抗议活动才能免遭暴力镇压。

#### **抑制原发性策略（The Deterrence of Primordial Strategies）**

政权通过提供物质报偿或身份地位的方式来鼓励地方干部们去追求工具性策略、放弃原发性<sup>1</sup>策略，从而满足国家政治体制的目标。<sup>18</sup>尤其是当斯大林对传统的民族精英进行了清洗和对地方机构施行了苏维埃化之后，这些干部们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够享有这些报偿。他们的特权地位在其他的备选制度（即使是独立）下都不能得到提高。事实上，苏维埃国家权力在他们的民族区域内的瓦解将意味着他们自身权力的衰落——甚至更糟。因此，这些干部们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抵制那些可能会颠覆现存联邦制度的任何议题表达。

报偿是与苏维埃发展战略的规范和目标紧密相连的。苏维埃联邦制度将这些地方干部整合进一个全联盟的行政架构中。这些地方干部只有在这个以完成配额和实现社会经济增长这类工具性指标作为衡量个人、集体绩效标准的激励体系中才能取得成功。通过这些干部整合进党和国家的官僚体系，苏维埃联邦政治也使以资源竞争为内容的“规范政治学”（“normal” politics）成

<sup>1</sup> Primordial的意思是“初发的、初生的、原始的”，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官员可能提出的在政府官方话语体系和政策目标之外并与之有一定距离的“自发的”观点或主张。本文暂时译作“原发性”。

为族群精英们的行为规范。这种莫斯科和各民族地区单元之间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向上级申请拨款。从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开始，在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各次会议上，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演讲为本地申请资金和项目就成为这些会议越来越显著的特征。<sup>19</sup>

运用未被许可的动员策略的那些人，将会受到惩罚，他们将被免去公职，从而被剥夺相关的一切报偿。官方机构的垄断权就意味着它能够完全剥夺人们获得这些报偿的机会，干部们将不可能重新获得个人生涯的成功。对那些清楚地表达出地方主义的（particularistic）、原发性议程的族群领袖进行惩罚，也能够阻止其他人进行这种诉求。从1960年起，超过12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被免职，原因就是他们或者亲自参与、或者纵容他人公开地表达了原发性的议程。例如，在1962年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之后，哈萨克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被免职，原因显然是他在醉酒状态下发表了不谨慎的言论——这些言论过于富有民族主义色彩。1966年，亚美尼亚的党第一书记被免职，因为他没能在亚美尼亚大屠杀15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阻止反土耳其的抗议活动。1972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书记双双被免职，原因是他们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national narrow-mindedness）”和对地方利益过度热心。<sup>20</sup>

### 制造官方的土著精英（Creating an Official Indigenous Elite）

由莫斯科的联盟最高政府赋予这些新的民族干部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在族群共同体内部阻止出现可能会对苏维埃制度构成挑战的反对派精英（counter elite）。在他们的自治区域内，这些干部执行的各项政策是中央政府制度和人事战略的延伸。这些政策力图实现：（1）在官方体制内，制造一个新的、开放的、由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构成的本地精英集团；（2）使精英身份与对专业的和物质的资源的占有相联结，同时阻止精英集团以外的人获得这些资源；（3）将对族群共同体的动员资源的接触途径局限在这些官方机构内。

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的时期，这些族群干部执行**肯定性行动政策**<sup>1</sup>，从而为那些期望在专业领域和知识界寻求更高职位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当地民族化**这一政策的扩展，向少数民族开放了整个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就业机会，集体化和工业化计划则提供了管理职位上的流动机会，在各共和国中创立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则极大地增加了为少数民族人口预留的专业职位的数量。

在苏维埃联邦政治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肯定性行动政策**使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ities）于其民族区域内部获得了在高等教育和专业职位上的特权地位。例如，1970年虽然格鲁吉亚人仅占格鲁吉亚共和国人口的67%（在大学年龄同期群中所占比例也大致如此），但他们在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中的比例达到了83%。<sup>21</sup>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区，1980年代中期，尽管摩尔达维亚人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二，但他们的学生在基什尼奥夫国立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中的比例至少为80%，而该大学是全国最好的教育机构。在对乌兹别克人在他们的共和国中迅速向上流动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时，Nancy Lubin认为，中亚人“倾向于首先雇佣‘他们自己的人’”。<sup>22</sup>

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种开放的职业机会只是一种粗糙执行的配额制。这种制度显然降低了高等教育和职业要求的客观标准，并且对居住在这一民族区域内的其他族群的“少数群体”实施了歧视。例如，Mark Popovsky宣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学里，

那些来自于原始村落的、几乎没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们获得了奖学金和免费住宿，并且无论他们是否学习都保证能够通过测试。在这种奇怪现象背后的理念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兄弟般的大家庭里，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因此各民族都能够并且必须拥有他们自己的知识阶层、他们自己的医生、工程师、作家和学者。<sup>23</sup>

苏联的官员曾警告说，在职位任命上对共和国的命名民族的偏爱是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例如，

<sup>1</sup>（译注）“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一词源自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开始实施的对少数民族成员在教育 and 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的政策性立法。

1986年，全联盟的党领导集团严厉谴责了吉尔吉斯领导人在为共和国的党组织选拔新成员时偏爱吉尔吉斯的候选人，而歧视居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族群的成员（尤其是乌兹别克人）。<sup>24</sup>

尽管如此，这些旨在扩展流动机会的政策，代表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对族群问题的精心考虑和适应。例如，从1950年到1975年，在加盟共和国的14个命名民族中（除了俄罗斯），科学工作者——科学学位的博士或候选人——的年增长率达到9.6%，这一增长率比俄罗斯人要高54%。<sup>25</sup>这种流动机会尽管要求对苏维埃政权保持政治忠诚，但并不要求否认族群身份。事实上，族群身份反而变成一项取得成功的条件，因为，在民族区域，高地位的职位通常是特殊的少数族群成员保留的。少数族群成员期望建立独立的分层体系（*separate stratification systems*），而苏维埃联邦政治则为他们实现这一抱负提供了机会——当然，其前提是该体系不能破坏苏维埃联盟的统一。

为了阻止在这一官方精英集团**内部**出现反对派精英，这些干部们同时掌管了一个由各种平行机构组成的庞大网络，用来控制专业领域的各个方面。<sup>26</sup>关于族群和民族区域的重要研究都由当地的学术机构和大学控制。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专业人士，如作家、艺术家或建筑师，如果想要在政权的文化垄断下传播他们的作品，就必须加入本领域在当地的官方协会。这一新的科学和文化精英集团的成员都依赖于官方机构，并且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通过加入这些官方机构之外创立的其他的、或对立的民族精英集团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这一事实对以下几类人尤为明显：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如专业协会的领导者；那些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中获得学术地位的人；以及那些要依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霸权性来取得成功的艺术家。清洗意味着双重剥夺的威胁，一是物质报偿，二是专业发展的途径。

为了阻止在这些新的专业精英和知识阶层**外部**出现反对派精英，地方干部们阻断了那些外部人士接触官方机构动员性资源的途径。这些干部禁止组建独立社团、切断知识阶层与民众之间的非官方沟通渠道、并对那些不成熟的反对派运动实施“斩首（*decapitating*）”——即通过对运动中的杰出人物进行威胁、监禁、甚或处决，来使这些运动失去领袖。那些外部的反对派精英只能使用一些低效的手段，例如非法社团、地下出版物和秘密传播。例如，1980年代中期反抗官方宗教体系的穆斯林就不得不依赖于从阿富汗抵抗团体偷渡过境的小册子来进行宣传——许多这种小册子还是手写的。而苏菲派（*Sufi*）的穆斯林则从欧洲的苏联反对派那里借用了一项技术：他们利用连锁信（*chain letter*）<sup>⑤</sup>来传递他们的宗教文件。<sup>27</sup>苏维埃政策对那些试图在官方机构之外阐述原发性议程的人给予严酷的惩罚。例如，在一次对被《乌克兰共产党人》（*Kommunist Ukrainy*）称作“虚弱的民族主义打了个嗝（*belching of debilitated nationalism*）”的打击行动中，克格勃（*KGB*）于1965年八、九月间逮捕了超过20位试图领导一场乌克兰文化复兴运动的知识分子。<sup>28</sup>为了镇压非官方的穆斯林传教活动，土库曼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于1982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对“社会流浪”罪（*the crime of “social vagabondage”*）可以判处最高两年的监禁和劳动改造。<sup>29</sup>在亚美尼亚，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逮捕行动试图通过对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实施专门打击而使那些运动失去领导机构（例如卡拉巴赫委员会）。<sup>30</sup>

#### 族群政治行动的后果（*Consequences for Ethnic Political Action*）

由官方机构垄断动员资源的后果之一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与地方干部的目标相一致的工具性政治行动能够获得实施持续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必需的资源。当然，原发性族群抗议的情况也会偶尔发生。例如，1969年9月的塔什干（*Tashkent*）<sup>⑥</sup>，在一场由当地的Pakhtar队与来自俄罗斯共和国的客队进行的一场足球赛后，一群乌兹别克人攻击了看热闹的俄罗斯人。<sup>31</sup>并且，在由官方发起的政治行动中，许多个体参与者也都怀有私人的原发性诉求。但尽管如此，当野心勃勃的反对派精英们试图发动和动员以原初性议程为目的的政治行动时，他们的力量还是被削弱了；而且，即使这种行动发生，原发性的抗议活动也多表现为一些单独的、低效的、小规

<sup>⑤</sup>（译注）要求收信人看过信后复写成一定份数，再分寄给其他人，以不断扩大收信人范围。

<sup>⑥</sup>（译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

模的事件。

即使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时期（period of perestroika），在那些由这些干部集团掌管动员资源的共和国里，他们仍然能够决定抗议活动将是长期的、大规模的，还是只是断断续续的、偶然发生的。通过对比在 1988、1989 年间出现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民众联合阵线（popular fronts）的不同命运，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一点。根据一个美国记者的说法，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强硬底线是乌克兰的族群意识觉醒晚于波罗的海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原因之一”。<sup>32</sup>相反，在波罗的海三国，地方干部们使民众联合阵线获得了原本由党和国家控制的动员资源。因此，拉脱维亚民众战线（Latvian Popular Front）的建立是有共和国党领导层参与其中的，而这是对其自治要求的强有力支持，他们的报纸是由官方出版社印制的，他们的计划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包括对 1988 年的萨尤迪斯会议（Sajudis Conference）进行两天的全程直播。他们的集会都是被批准的，包括在爱沙尼亚中央委员会政治启蒙厅（Estonian Central Committee's House of Political Enlightenment）举行的三个波罗的海民众联合阵线的集会。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也获得了许可。正如萨尤迪斯议会的主席 Vytautas Landsbergis 在接受 Tygodnik Powszechny 采访时所言，他领导的运动所具有的行动能力依赖于该运动与共和国的党政府的密切关系。<sup>33</sup>而 1990 年的共和国大选进一步显示出这些地方干部的重要性：波罗的海三国的干部们允许主张不同的族群议程的候选人参选，而在其他共和国如白俄罗斯，地方干部们则禁止这种情形出现。<sup>34</sup>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地方干部已经煽动了许多抗议活动。在波罗的海各国，那些支持对国家语言和共和国主权问题进行立法的游行示威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据报道，在 1988 年 11 月，爱沙尼亚党领导层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成员施加压力，使其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随后又精心策划了游行示威活动，从而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自身废除一切联盟法律的权力。类似地，在 1989 年 5 月，立陶宛党领导层在维尔纽斯（Vilnius）<sup>7)</sup> 发动了一次支持立法倡议的游行活动，该项立法将赋予共和国废除和要求豁免新出台的联盟高速公路税的权力。<sup>35</sup>在纳卡地区（Nagorny Karabakh）<sup>8)</sup> 和亚美尼亚，要求亚美尼亚合并卡拉巴赫的游行活动从 1988 年初开始，得到了当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支持——包括对由地方苏维埃提出的合并理由予以正式立法。很显然，在 1988 年 11 月底发生的许多驱逐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以及驱逐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的暴力行动都是在当地党政官员的支持下进行的。<sup>36</sup>而在那些领导者采取果断行动以阻止抗议活动（例如 1989 年中期以前的乌克兰）或封锁言论（例如 1989 年 4 月发生 5 天抗议活动后的格鲁吉亚）的国家，未来的政治行动通常是偶发的和小规模的。

不同族群在发动大规模的、持续的政治行动上的能力差异，是与他们本族干部所控制的资源密切相关的。那些能够掌控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的干部们拥有最大的动员机会。在另一个极端，那些没有自治的民族区域或生活在自治区域之外的族群则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尽管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具有地方动员能力的干部和精英，例如，嘎嘎乌孜人（Gagauz）<sup>9)</sup> 在南摩尔多瓦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的政府机构中寻找他们的精英。而居住在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飞地”俄罗斯人（“Exclave” Russians）则在这些国家的工厂经理和下层党政官员中寻找他们的精英。<sup>37</sup>那些连这样的资源也不具备的民族无论以何种形式试图发动持久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都将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因此，犹太人的抗议活动总是偶发的和小规模的：例如，在 1988 和 1989 年，最大规模的犹太人游行也仅仅吸引了几百人参加，而大多数游行只有二、三十人参加。<sup>38</sup>

---

<sup>7)</sup>（译注）立陶宛共和国首都。

<sup>8)</sup>（译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的自治州，人口超过 95% 为亚美尼亚人，1991 年宣布独立，但除亚美尼亚外不被国际所承认。目前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由亚美尼亚支持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队也控制着阿塞拜疆西南部的许多土地。

<sup>9)</sup>（译注）又称“蓝色乌古斯”，是信仰东正教的突厥人。

## 起源：族群联邦政治的兴起 (Origins: The Rise of Ethnofederalism)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三项变化使苏联的发展战略演变为引发族群联邦政治的根源。第一，随着对赫鲁晓夫的恐怖措施的清理和勃列日涅夫的“尊重干部”政策（这一政策表明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在降低）的出台，地方干部们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来推动他们的地方主义议程（*particularistic agendas*）。<sup>39</sup>第二，随着这些地方干部在他们的族群共同体内部建立起制度性的、甚至是来自民众的支持，他们对中央的依赖程度降低了。这些新的权力基础使他们能够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立场以对抗莫斯科。第三，在民族区域内部，这些地方干部获取能保证继续拓展他们流动机会的资源变得越来越难。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通常会诉诸于动员精英发起立法议程、动员民众举行族群抗议活动的策略，这种策略能够保证他们持续从莫斯科获得额外的资源以维持他们在民族区域的统治霸权。讽刺的是，后面这两点变化恰恰是先前设计的由这些地方干部来代表中央控制当地族群共同体这一统治方式的自然结果。

**肯定性行动**政策允许这些地方干部在他们的族群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更有保障的政治基础，因为这些政策制造了一个忠诚的被保护群体（*a loyal clientele*）。后斯大林时代的地方分权体制也同样有助于这一被保护群体的产生。随着许多行政任务从联盟转移到各加盟共和国或共和国下属部门，以及地方干部在人事安排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干部们对这种被保护机会（*patronage opportunities*）的控制力增强了。为了巩固这些地方精英的忠诚度，他们的职位任期被延长，而且在民族区域之间的人事轮换也被减少——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显著。<sup>40</sup>这种权力基础削弱了中央的政治整肃所带来的威胁，因为它使莫斯科在罢免一个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时将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罢免Dinmukhamed Kunaev的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引发了两天的骚乱。在对关键政策进行谈判时，由族群精英们所发展起来的各族群选民团体成为这些精英与联盟领导公开对抗的重要资源。<sup>41</sup>

近几十年，随着地方干部们在族群共同体内的垄断性领导权开始面临日益增加的威胁，他们对本族群选民进行动员的动机提高了。第一个威胁来自于当地的专业精英和知识阶层自身。此前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而他们都拥有足够的技能，从而使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另一个威胁来自于对物质报偿和流动机会的要求日益提高与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不断降低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考虑到这一精英集团的庞大规模和已经处于很高水平的物质报偿，提供能够确保他们持续忠诚的更大量的物质报偿变得越来越难。第三个威胁来自于为吸纳新成员而不断扩大精英集团的规模时所遭遇的越来越大的困难。庞大的专业精英和知识分子团体的快速成长，已使一些族群共同体的精英职位几近饱和。而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又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使地方干部在两个方面的能力都受到了威胁：一是继续提高精英集团的物质报偿和为精英集团的新成员提供流动机会的能力；二是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以确保民众站在自己这边而不是倒向替代性领袖的能力。简言之，在过去的30年中，地方干部们惯用的管理手段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而这些手段先前成功地抑制了反对派精英的成长，并阻止了基于原发性议程的民众动员。对苏维埃发展战略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因为这些威胁正是那些先前用来控制族群自决主义的手段成功实施后所产生的副产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经历这种威胁的族群数量不断增加，一项危机逐渐显现。族群干部们不得不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获得额外的资源，结果是造成了各个族群共同体对稀缺资源的相互竞争。但是，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使莫斯科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这些不断提高的要求。面对这一危机，族群干部们发现，他们必须对莫斯科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获取投资，同时，必须设

---

<sup>40</sup>（原文脚注）例如，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的任期在1960年1月1日之后的十年间几乎翻倍，从4.5年增至8.7年，而再经过十年则增至12.0年。

计出更加巧妙的策略来强化他们的要求的迫切性。例如，在向莫斯科要求更多自治权的过程中，波罗的海各国的党领导层通过立法直接摊牌，并且动员民众游行来支持共和国精英们的政治立场。<sup>42</sup> 族群干部们发现，这种策略能够使非独立的精英和那些追求精英地位的人结成紧密的联盟。甚至那些有抱负的、独立的、追求原发性策略的政治活动家也常常加入由这些干部所发动的政治行动，并认为参与这些行动是将他们自己的想法诉诸公众的最好的或唯一的方式。干部们通常具有强烈的动机去与潜在的反对派精英（例如民众联合阵线）合作，以增强其对莫斯科的压力。因此，在 1980 年代末期，出现了统治精英与潜在的反对派精英合作对族群共同体进行动员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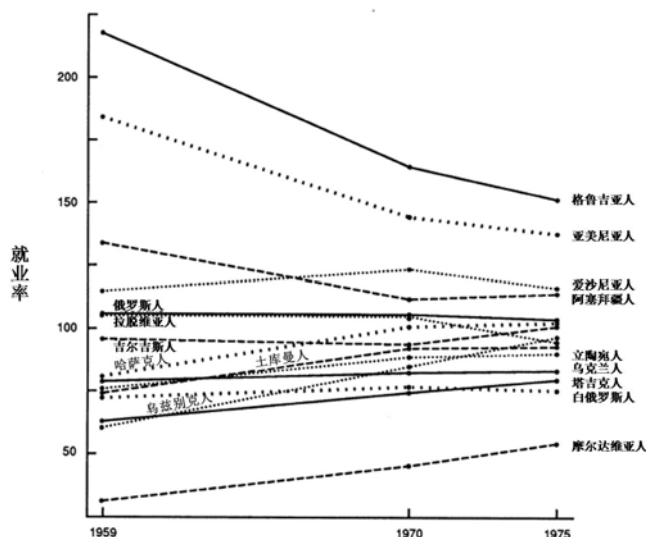
### 范围：族群联邦政治的起火点 (Incidence: Flash Points of Ethnofederalism)

苏联的族群联邦政治的模式还隐含了一个更具讽刺意义的悖论：恰恰是那些先前在苏维埃发展战略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族群干部们具有最高的对本族群选民进行动员的动机——这一现象在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各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正是这些先前在执行**肯定性行动**和制造民族精英集团的战略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族群干部们如今承受着最大的来自反对派精英的压力、在进一步扩展精英职位和提高物质报偿的问题上遭遇了最大的困难，而他们的职位也面临着最大的威胁。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族群共同体中，族群干部所承受的压力是由**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再分配结果所引起的。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些政策的再分配结果发生了改变：那些原来在民族区域内的命名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的转移支付逐渐变成了在加盟共和国的主要命名民族之间的转移支付。现在的这种转移支付使那些更为现代化的族群共同体的利益受到了不利影响。

通过在各族群内部培养起一批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苏维埃发展战略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平抑族群间利益差异能力。在那些在社会经济成就最低的民族中，流动机会的增长是最快的。<sup>43</sup>因此，如图 2 所示，在后斯大林时代，各民族的精英职业地位间的差别变小了（该差别的测量指标是在高等教育专业职位上的人均就业机会）。<sup>44</sup>

图 2 1959-1975 年间各族群的均等化趋势<sup>a</sup>  
每 1000 名成人拥有高等教育专家职位的数量（设定 15 个民族的平均值为 100）



来源：Calculated from data in Ellen Jones and Fred W. Grupp, "Modernization and Ethnic Equalization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36 (April 1984), 159-84.

a 该图追踪了在能够获得资料的年份，在苏维埃经济体中，所有加盟共和国命名民族在精英职位上的就业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再分配是莫斯科在各共和国间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例如，在包含了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在内的**统一的国家预算**（Unified State Budget）中，资金从较发达的共和国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共和国。在1989年的预算中，只有中亚五国被允许全额保留本地征收的流转税和所得税；此外，它们还获得了财政补贴，塔吉克共和国获得的最少，为3.21亿卢布，哈萨克共和国获得最多，为27亿卢布。与此相对，拉脱维亚共和国被允许保留的流转税的比例是最低的（56.8%），而亚美尼亚共和国（76.7%）和爱沙尼亚共和国（79.4%）保留的税额比例也仅稍稍多于四分之三。<sup>45</sup>尽管这些官方统计数据可能夸大了这一问题的程度，但可以预料的是，那些较不发达的共和国获得了高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投资比率。尽管这些较不发达共和国的财政收入要较发达的共和国低得多，但各共和国在健康和教育上的人均消费额是大体相等的。<sup>46</sup>

事实上，这种培育当地精英、通过严格的资源配置手段来推动平等的政策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后果：一些原来的优势集团将在生活机会上相对受损。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示了这种原来的优势集团的生活机会受到限制的问题：苏维埃大学录取犹太学生的强制性配额。在1970年，尽管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占到了2.3%（这一比例高于官方统计中犹太人的口数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70年占0.89%），但是，这一比例从1935年起已经显著下降了。在1935年，这一数字是13.3%。与苏联人口中获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不断提高的总趋势相反，在18-23岁的苏联犹太人中接受全日制大学教育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至多在从1935年到1965年间仅微小地提高至36%。因此，许多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无法实现，进而也就丧失了获取精英职位的机会。<sup>47</sup>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多的族群开始感受到这种生活机会的减少。根据Lubin的说法，在中亚，“俄罗斯人开始感觉到，在与亚裔对手竞争一个职位时，他们总是被拒绝，尽管他们具有同等的、甚至更高的资格条件。”<sup>48</sup>波波夫斯基（Popovsky）抱怨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乌兹别克人几乎找不到工作。”<sup>49</sup>

在苏维埃联邦政体这样一个地缘分割型的多族群社会（geographically segmented multiethnic society）中，只要经济增长能够为各个民族区域的所有命名民族持续地提供流动机会，那么这些政策引起的再分配后果就不会在联邦政治中成为引发争论的议题。在高经济增长率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命名民族能够通过将负担转嫁给本国少数民族群的方式（即对少数群体实施差别对待）来逃脱在各共和国间进行转移支付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居住在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群（包括那些“飞地型”少数民族群（“exclave” minorities），如犹太人或俄罗斯人）是共和国间的转移支付的最大受害者。然而，经济增长的停滞使各命名民族越来越难以逃脱这种共和国间的转移支付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就导致了再分配问题成为一个在地方干部中引发广泛争论的议题。在国家对资源配置实行严格控制的时期，苏维埃发展战略的影响在于，在为较不发达的族群共同体提供持续的流动机会的同时，限制了较发达的族群共同体内部流动机会的增长。

结果是，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族群共同体（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的干部们领导了推动族群立法的议程，而那些较不发达的族群共同体（最明显的在中亚）的干部们则很少这样做（见表1）。作为中央强力推行的发展战略的持续受益者，后者总是对那些发达的族群共同体的同侪们提出的地方分权提议予以严厉批评。例如，在全联盟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否决爱沙尼亚的无效法案（act of nullification）的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常务会主席（Khabibullaev和Pallaev）对爱沙尼亚的动议予以了激烈的批评，并对中央集权政策给予了热烈的支持。<sup>50</sup>同样，在较发达的族群共同体中，抗议活动更为普遍。游行示威活动的数量（表2）和教育成就的水平（图1a）之间的等级相关（rank-order correlation）是0.67。<sup>51</sup>

## 议程：关于资源和生活机会的联邦政治学

（Agendas: The Federal Politics of Resources and Life Chances）

这些与族群干部相关的政策塑造了族群联邦政治的公共议程（public agendas），这一塑造过程是通过控制支配性议题进入立法程序的途径以及决定哪些议题能够获得持续的大规模政治声援而实现的。地方干部们必须设定族群政治的议题，以便尽可能多地使本族群共同体的成员加入到“官方的”族群运动潮流（“official” ethnic bandwagon）中。通常，这需要对占优势的热门话题进行重新定义，尤其是当这些话题具有原发性（primordial）特征时。地方干部们必须否决掉这类来自潜在的反对派精英的选民团体和议题，尽管同时也需要利用他们对莫斯科施加压力。衡量地方干部的企业家精神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对本区选民而言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的关注植入公共议程，而结果却是使自己的权力基础得到保护或提升。在地方干部们的议程表上，主要的议题反映出他们在自己的族群共同体内部面临的威胁：这些议题与资源和生活机会相关。特别地，这种关于流动机会的政治学是通过许多重复出现的政策议题表现出来的，这些政策议题触及了苏维埃发展战略的基础，而正是这一发展战略创造和维持了庞大的地方干部集团。这些政策议题包括：联邦政治（federalism）、当地民族化（indigenization）、语言（language）、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人口迁移（migration）。

### 联邦政治

联邦政治中最反复无常的议题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平衡，因为管理干部能够控制的资源和他们在族群共同体内部的流动机会是不确定的。党领导层利用这些议题来将要求独立的原发性关注与在苏维埃联邦政治内部要求扩大共和国自治权的工具性要求结合起来。<sup>52</sup>对地方干部而言，扩大自治权是增加他们所控制的资源的一种途径。自治将提高他们在共和国内部分配权势职位及管理教育、就业政策等的决策自由。对较发达共和国的地方干部而言，他们因为肯定性行动而倍感遭受剥夺，自治则是保留本国资源的一种方式。

那些较发达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干部们很快就高举起要求自治与主权的旗帜，旨在抵制全联盟的再分配政策。因此，例如，在1989年，立陶宛的领导层要求豁免全联盟的高速公路税，因为该税种是按车辆征收的（在相对富裕的波罗的海地区，车辆数量较多），却将被超比例地用于那些较不发达的共和国的公路建设和维修。<sup>53</sup>在波罗的海三国，对“地区性经济责任（regional economic accountability）”“地方成本会计（territorial cost accounting）”和“自主财政（self-financing）”的呼声为这些共和国的地方干部从中央部委攫取产业控制权的努力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计划将引入一些机制以使这些共和国的市场与更大范围的短缺经济隔离开来。这些机制包括：对其他加盟共和国实行出口壁垒，利用身份证限制其他共和国的来访者购买本国产品，在共和国一级制定价格以提高国家间的交易费用，甚至在一些共和国中使用非统一货币。<sup>54</sup>

对那些在其他民族的加盟共和国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地方干部而言，自治议题通常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提升其所在民族区域在联邦政治体系中的“地位（status）”——该“地位”可以是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oblast）或自治区（okrug）。一个民族的干部集团能够控制的资源是随着其民族区域在联盟政治体系中的层级的提高而提高的。因此，在1988年的《真理报》（Pravda）上刊登的一篇关于支持将鞑靼自治共和国升级为加盟共和国的公众集会的报道，作者Rafail Mustafin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加盟共和国的提议？是在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间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鞑靼斯坦比有些加盟共和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工业潜力。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自己的电影制作室，我们只有一间出版社（而且还不够大），而用来印刷书籍、报纸、杂志的纸张却极度短缺。<sup>55</sup>

基于类似的目标，阿布哈兹（Abkhazia）共和国的党领导层要求将他们的自治共和国升级为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嘎嘎乌孜人的领袖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自治共和国，立陶宛的Shalchinin区的波兰人的领袖也要求自治地位。在最后一个事件中，《消息报》（Izvestia）指出，“也许最让波兰人愤愤不平的一点是”，在立陶宛，“他们不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获得高等教

育。”<sup>56</sup>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那些其他“从属的”少数民族的地方干部会动员他们的人民要求对其所在区域的权力体系（the lines of authority）进行改革。在一个由其他民族命名的共和国中，从属民族发现它所能获取的资源和生活机会都是有限的。在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抗议：尽管他们的自治州在共和国中人均工业产值名列第二，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分配给它的人均投资额却低于平均水平。据称，该自治州的第一书记G. A. Pogosyan对联盟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说，“直至今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没有自己的面粉厂、没有自己的集中养殖的饲养场、没有自己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厂，也没有自己的房屋建筑的联合组织。”在社会领域，这类投资尤其落后。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抱怨说，州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投资不足，而巴库（Baku）<sup>60</sup>又反对该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进入邻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教育机构，这导致居住在该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取更好职业生涯的机会。<sup>57</sup>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重新划归给亚美尼亚共和国将结束阿塞拜疆人的歧视，并使亚美尼亚多数群体获得在整个加盟共和国内的流动机会<sup>58</sup>。

（阿兹哈自治共和国（Adzhar Autonomous Republic）及南奥赛蒂自治州（South Osetian Autonomous Oblast）的领袖们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并要求脱离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司法体系）。<sup>59</sup>

### 当地民族化（Indigenization）

命名民族的地方干部还会为保留**当地民族化**政策的成果而进行政治行动的动员。干部们早已发现，**当地民族化**这一议题既能够利用本族群共同体内追求精英地位的那些人的工具性利益诉求，又能够利用将民族相似性当作统治合法性之必要条件的那些人的原发性利益诉求。对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干部而言，风险存在于他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动自己的支持集团（supporting clientele）和大众选民（popular constituencies）。在哈萨克斯坦，1986年解职第一书记Kunaev和整肃共和国党政机构的行动对那些主要由第一书记的部族集团成员组成的委托人网络构成威胁，也使那些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地方领导层紧密联系起来的地方民族成员的职业前景受到了威胁，因此，该行动激起了一波暴力抗议活动。<sup>60</sup>更近一些，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动员了若干民众抗议活动以反对莫斯科干预共和国的人事政策——尤其是干预格鲁吉亚歧视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

居住在其他民族的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地方干部们对本族民众的动员则指向相反的方向——批评命名民族对**当地民族化**政策的滥用并呼吁莫斯科对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干预。由命名民族制造出来的族群精英和知识分子通常会剥夺本民族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许多生活机会。在最近的一次由科学学会民族问题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 on Nationality Problem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赞助的圆桌会议上，E. V. Tadevosian抱怨说，**当地民族化**政策常常导致在一些民族的共和国的“国家机关、行政管理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和教职工队伍等中出现人为造成的命名民族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的现象，而这是以牺牲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sup>61</sup>在摩尔多瓦的嘎嘎乌兹人和阿塞拜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爆发了针对在政治任命和职业机会上的歧视行为的抗议活动。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声称，在他的共和国里，由这种不满和怨恨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不仅仅出现在1989年，同样出现在1957年、1967年和1978年。<sup>62</sup>

### 语言

为保护族群**肯定性行动**得以实施的基础，地方干部们还进行了政治运动的动员来提高或保护他们各自族群共同体语言的地位，在流动机会与本民族语言的地位之间具有无法割裂的紧密联系。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风险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始终在获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方面享有特权。例如，在大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对共和国内部不同族群的录取率和此后的职业机会都会产生影响。但

<sup>60</sup>（译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

<sup>58</sup>（原文脚注）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委员会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将纳卡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

是，语言同时又是定义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原发性指标。

加盟共和国的干部们通过立法使当地民族语言取代俄语而成为在其共和国内部的交流语言，这样，他们就加强了当地民族对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控制力。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1978年宪法中包含了这样的条款：以命名民族的语言作为共和国的国家语言(state language)。1978年4月14日，约5000名格鲁吉亚示威者举行了游行，抗议莫斯科修改这一条款的企图。当地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精英们尤其热切地要求保留格鲁吉亚语作为他们的专业领域中的论述语言，格鲁吉亚学生加入了抗议活动。正如Ronald Suny所言，这一语言条款将确保“格鲁吉亚的高等教育成为格鲁吉亚人的特权，而其他民族则发现他们很难进入高等学府求学。”<sup>63</sup>在1988年和1989年，又有6个共和国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语言。

居住在其他民族的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干部们则发动了政治运动，明确抗议这种对命名民族的语言赋予优先权的规定。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干部而言，许多事情都面临着风险：控制流动机会的能力、作为其权力基础的本族人民的未来的地位、甚至他们自己的职位。反对新语言法的抗议者包括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立陶宛的“飞地”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以及摩尔多瓦的突厥语系的嘎嘎乌兹人和“飞地”俄罗斯人。新法律将他们置于了不利地位。爱沙尼亚的非爱沙尼亚官员发动了罢工，抗议一项将解雇不能在四年内学会本国语言的人的法律。1989年3月14日，多达60,000名俄罗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根据《消息报》的数字）走上塔林(Tallinn)<sup>64</sup>街头，抗议“爱沙尼亚的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运动”。据报道，共和国内的俄罗斯人共产党官员和工厂经理向他们的人民发起了动员，因为他们担心1989年1月18日的这项法律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职位。<sup>64</sup>

### 发展与移民

为了保存其权力赖以存在的族群排他性机构，地方干部们发动政治运动来抵制全联盟的经济发展和移民政策。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但在公共讨论中它们却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快速工业化将成为吸引其他民族的工人迁移本地的磁石。对当地百姓来说，移民带来的威胁包括：稀释本民族共同体、提高国内政治和经济领域中领导职位的竞争强度、丧失**肯定性行动**带来的生活机会上的优势。对地方干部来说，移民则对作为其权力基础的族群共同体构成威胁。其他族群的成员将进入共和国的精英队伍，这给地方干部们带来了压力——这将降低精英队伍的民族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正是干部们的权力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于一个命名民族而言，如果不能在共和国内部保持人口数量上的支配地位，由该族群成员排他性构成的地方干部集团就可能会被具有更多样的族群构成的干部集团所代替；这可能导致加盟共和国被降级为自治共和国（就像在Karelo-Finnish共和国发生的情况一样），或甚至造成自治地位被彻底取消。因此，早在1960年代初，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的官员们就曾反对赫鲁晓夫在这些共和国内进一步扩展重工业的计划，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项计划会带来更多的俄罗斯工人。<sup>65</sup>据报道，亚美尼亚官方在埃里温(Erevan)<sup>66</sup>地铁的建设工程中，将俄罗斯工人排除在永久性住房福利之外，以阻止他们留下。在1980年代末期，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亚美尼亚，示威者要求赋予他们的共和国以控制工业和农业政策的权力，目的是延缓外来移民流入。爱沙尼亚的地方干部则试图在未来的选举中减少移民对本民族选区的影响——爱沙尼亚共和国通过立法剥夺了那些在一个选区居住时间少于2年（或在本国少于5年）的居民的选举资格和在一个选区居住时间少于5年（或在本国少于10年）的居民的被选举资格。<sup>66</sup>

## 自决性联邦主义在体制改革中的风险

<sup>63</sup>（译注）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

<sup>64</sup>（译注）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

<sup>66</sup>（原文脚注）在此项立法被全联盟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宣布无效后，爱沙尼亚又实施了一项新立法，要求所有申请共和国的职位的候选人必需已经在爱沙尼亚居住了至少10年。

(The Risks of Assertive Federalism under Perestroika)

在体制改革中，民族区域的地方干部们需要在一种更为复杂的局势中推行他们关于族群联邦政治的议程。在他们的民族区域内，他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对三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进行控制和平衡，从而使这些常常产生分歧的议题背后的分散的行动力量集中起来。与这些地方干部们的自决性联邦主义并行的是另一个竞技场——民众联合战线的组织能力和示威活动。特别地，通过利用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精英，联合战线的行动常常会导致对族群共同体的原发性利益的表达。第三个竞技场则是主要由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所引发的族群间的暴力冲突（communal violence）。在高加索地区，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发生在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之间，以及格鲁吉亚人与奥赛蒂人之间。在费尔干纳（Fergana）地区，乌兹别克青年袭击了莫司科伊人（Meskhetis），而在中亚的Novyi Uzen地区，哈萨克青年对移民发动了袭击（见表3）。<sup>67</sup>在许多共和国中，族群干部都试图利用第二类行动带来的政治压力作为与莫斯科谈判的资本。尽管干部们并非赞同联合战线的议程提出的所有事项，但他们确实发现，这些联合战线能够增强他们与莫斯科谈判的实力，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声称地方力量是联合在一起的。在一些情况下，干部们甚至会鼓励第三种类型的政治行动，目的是强化其对当地的控制和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例如，据报道，阿塞拜疆的地方党领导层不仅鼓励民众联合战线的发展，而且还帮助建立了更具有军事性和暴力倾向的民族防御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sup>68</sup>

表3 族际暴力冲突中的死亡人数  
(1985年9月1日——1989年8月31日)

族群	估计死亡总数
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	>110
乌兹别克人—莫司科伊人	>100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	14
哈萨克人—非哈萨克人	5
塔吉克人—莫司科伊人	2

来源：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89, June 25, 1989, June 26, 1989, July 17, 1989, September 5, 1989, September 17, 1989.

这些地方干部们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些策略可能会削弱他们的地位，甚至释放出他们不能控制的力量。例如，莫斯科可能会采取高压政策，就像1988年和1989年的情形，当时联盟领导层免去了超过2500名官员（包括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他们煽动和鼓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族际暴力冲突。<sup>69</sup>拥有强大的本族群选民的地方干部可能会铤而走险，他们预期莫斯科可能不会免除他们的职务或者会因代价过大而不愿意采取这样的行动。Vladimir Shcherbitskii就凭借其在乌克兰所拥有的广泛的权力基础使得1989年对他的免职成为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最终通过戈尔巴乔夫的煞费苦心的制度操纵才得以实现。发生在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运动则是由Kunaev被免职所带来的代价高昂的后果。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莫斯科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在1988年和1989年，14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0个的党第一书记被撤换；并且在这些事件中，至少有8例书记们是由于对共和国政策不满而被撤职的。<sup>70</sup>

这些地方干部还面临着另一个风险：那些受到自决性联邦主义威胁的人会发起抵制行动。事实上，正是摩尔多瓦实施新语言法的压力激起了国内嘎嘎乌兹人的抗议运动；但是嘎嘎乌兹人的议程却突破了语言问题，而涵盖了对其在经济、政治领域所受到的歧视待遇的反抗。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摩尔达维亚人的动员行动引发了居住在这里的“飞地”俄罗斯人发起各

<sup>68</sup>（原文脚注）有些人认为，党领导层煽动暴力冲突的动机是为进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事实并非如此。

种反向动员行动，领导这些反向动员行动的组织包括：*Interdvizhenie*<sup>69</sup>、立陶宛捍卫苏维埃权力委员会，以及*Edinstvo*（unity）<sup>70</sup>。此后，中亚那些较不发达的共和国的地方干部们可能也会发起类似的反向抗议运动，其目的是削弱这些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地区的、旨在抗议莫斯科的再分配政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所产生的政治影响。<sup>71</sup>

地方干部们面临的第三个风险是，他们动员发起的政治运动可能反过来促进了反对派精英出现并发起他们自己的动员行动。许多表面上看来是由地方干部们发起的“花车运动”（bandwagoning）<sup>72</sup>可能实际上却被潜在的反对派精英搭了便车；也就是说，那些野心勃勃的独立政治活动家在将“官方”的政治行动作为幌子的同时，仍然坚持自己独特的议程，并在这一幌子的遮掩下暗地进行他们自己的动员行动，借机使他们的议程得以在公众中传播。<sup>73</sup>地方干部们的策略并没能使这些潜在的反对派精英失去支持者，相反，这可能反倒为他们提供了扩大群众基础的机会。在一些共和国中，由地方干部们发动的政治行动发展出了自我维持机制（become self-sustaining）并脱离了干部们的控制，并为反对派精英提供了一场现成的运动。在亚美尼亚，至1988年夏末，地方干部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对卡拉巴赫的抗议运动的控制能力。一份TASS报告称，“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前任领导集团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并节节败退，利用这一情势，（卡拉巴赫）委员会的成员建立起了他们的组织网络和政治体系。”<sup>74</sup>1989年，在阿塞拜疆人的抗议运动中，控制纳卡地区局势的主动权显然从干部们手中转移到了民众联合战线中的反对派精英手中。而到了1990年初，阿塞拜疆民众联合战线已在诉苦称，控制族际暴力冲突的主动权已经从他们的手中转移至民族防御委员会的激进派手中。<sup>75</sup>据报道，当立陶宛的党第一书记Algirdas Brazauskas发现那些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萨尤迪斯（Sajudis）<sup>76</sup>代表们竟然反对他成为共和国的最高长官，而是选举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兰茨贝吉斯（Landsbergis）时<sup>77</sup>，他非常震惊。<sup>75</sup>

最后，地方干部们的策略可能会助长那些他们并不期望看到的原发性暴力事件。在1988、1989和1990年，在埃里温和巴库的民众游行示威成为了席卷各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催化剂。小群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攻击了他们的共和国里的少数民族群，这些少数民族群中的许多人因为受到恐吓而被迫移民，而另外一些则被杀害了。

## 政治制度与政治化的族群问题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ized Ethnicity）

从1950年代中期起，自决性族群联邦政治在苏联的兴起，显示出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了族群共同体动员能力的形成。一方面，苏维埃联邦政治延缓了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起源（origins）；但另一方面，它使诸如企业家技能和沟通途径这类动员资源散布开来，并最终决定了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范围（incidence）和议程（agendas）。

这种强调制度的视角能够为以往的研究提供一种修正，那些研究在解释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原因时，总是过于强调态度而忽视了进行族群动员所必需的资源。这些研究至少引入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族群政治学研究范式（two alternative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ethnopolitics）。这两种范式的区别在于，在关于族群身份的性质、凝聚力的来源，以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抗议行动的目标等问

<sup>69</sup>（译注）这是一项旨在保护摩尔多瓦的俄罗斯语居民的利益的运动，该运动抵制将摩尔多瓦语/罗马尼亚语规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后来支持德涅斯特独立。

<sup>70</sup>（译注）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其基本任务是在保加利亚各地建立类似的分支机构，并与它们保持密切联系，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保加利亚人的统一”，并改善他们的目前的政治处境。

<sup>71</sup>（译注）指大部分参加者都是盲目从众而形成的声势浩大但华而不实的运动。

<sup>72</sup>（译注）立陶宛的国家改革运动组织。

<sup>73</sup>（译注）立陶宛民族运动的首领，1990年3月，立陶宛在其领导下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题上，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原发主义**（*primordialist*）范式将族群身份视为社会存在的预设事实，是由历史记忆、语言、宗教和地理聚居所形成的。族群问题政治化是共同体的自我发现，而抗议行动则通常是加强共同体团结的一种表达行动。<sup>76</sup>**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范式则将族群身份视为偶然形成的、不断变动的自我归因性角色。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抗议行动都是目标导向的行为——通常集中于追求社会、经济利益。根据工具主义范式，当特殊的族群身份能够带来相对于其他族群、阶级等的比较优势时，该身份就会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sup>77</sup>

在**苏维埃政治研究**（*Sovietology*）中，主导的范式是原发主义的。在解释苏维埃族群政治的起源时，它强调的是诸如同化这样的态度因素，而不是动机或行动约束条件。<sup>78</sup>当然，这些态度因素是当前危机的重要成分。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仅仅这些态度本身就能够解释族群政治学的兴起——没有证据显示，1955年以后，与此前相比，同化过程放缓了、同化压力加强了、或民族意识提升了。苏维埃的族群融合（*ethnic fusion, sblizhenie*）政策旨在降低族群间的文化壁垒和实现民族合并（*merger, sliianie*），该政策的失败并不能解释在过去的30年间族群自决主义（*ethnic assertiveness*）的兴起。

在预测族群自决主义的影响**范围**（*incidence*）时，原发主义范式认为，在抵制苏维埃政权诸项政策的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运动应该发生于那些在文化上与俄罗斯多数族群较疏远的少数群体。<sup>79</sup>它尤其关注伊斯兰教，认为它为苏维埃穆斯林提供了一种文化纽带，并且，如Kemal Karpat所言，“创造了一座看不见的壁垒，将他们与斯拉夫统治者分割开来”。<sup>80</sup>更进一步，Alexandre Bennigsen和S. Enders Wimbush称，“决定苏维埃穆斯林对苏维埃俄罗斯国家持有何种程度的长期承诺的关键性议题并不是‘社会-经济’，而是身份认同。”<sup>81</sup>然而，与这些预期相反，那些在文化上与斯拉夫较疏远的民族是最没动静的。没有证据显示，原发性情绪的强度是将那些致力于持续且有效的政治运动的少数群体与那些毫无动静的少数群体区别开来的指标。原发主义范式不能预测**起火点**（*flash points*）分布的模式。<sup>82</sup>

原发主义范式还预测，抗议行为将是以文化表达议程为基础而被动员起来的。然而，苏维埃联邦政治却提出了许多这一范式无法很好解释的问题。例如，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阿布哈兹人和南奥赛蒂人的领袖们提议将本民族区域的司法权移交给俄罗斯共和国，这表明，这些族群接受而不是反对苏维埃联邦政治及该体制对少数族群利益所给予的制度性保护。那些整合了地方干部的立法议程的条款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自治权、当地民族化、语言、发展和移民，这显示对大多数族群干部而言，这些公共议程并非一种基于文化身份的原发性自决主义，而是一种对其他利益的工具性追逐。因此，这一流行范式关于族群政治学的议程所做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

同样，仅仅依赖于工具主义范式的分析，也会导致错误的预测。它会忽视原发性情绪在民众中所具有的强制力，而这种强制作用必定会被包含在苏维埃族群企业家们的议程中。它会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当地地方干部的动机和工具性约束条件发生改变时，他们可能会转向原发性的议程。它将无法解释像兰茨贝吉斯这样的反对派精英为什么会愿意以牺牲社会经济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我表达的符号性议题。

上述的预测错误表明，这种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态度因素上的单一研究范式（如原发主义或工具主义）是狭窄和不完整的。这些范式都没有注意到两个事实。第一，维持原发性议程或者工具性议程的态度因素在许多苏维埃族群共同体中是并列存在的，并且通常在每个人身上也是并列存在的。<sup>83</sup>这些态度无论在地方干部身上还是在普通大众身上都是同时并存的。第二，无论是原

<sup>82</sup>（原文脚注）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族群领袖们的族群自决主义可以看作是这些地区已经具有相对程度的族群意识（*relative levels of ethnic awareness*）的证据。通过强调这一点，这一范式似乎可以获得“拯救”。然而，在这个意义上，相对程度的民族意识（*relative leve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并不是族群问题政治化的预测变量，也不能与之构成因果关系，相反，它只是一种描述或定义。

<sup>83</sup>（原文脚注）在许多西方社会，事情同样如此。

发性的情感表达，还是工具性的利益诉求，如果将其政治化并发动族群共同体进行持久的、大规模的政治行动，那么，这些态度因素就必须要与能够对族群共同体实施动员的资源结合起来。对解释族群政治学而言，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所关注的态度因素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充分的。

政治制度——如苏维埃联邦政治——在这种态度与资源的结合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并因此在塑造族群共同体、政治化族群问题和动员抗议行动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制度赋予了政治企业家以权力，同时迫使他们在原发性策略和工具性策略中做出选择。<sup>84</sup>族群问题政治化就正是这些被苏维埃联邦政治所制造出来的政治企业家们的杰作。<sup>85</sup>在1990年之前的30年间，莫斯科所面对的由各族群的利益诉求所造成的压力，主要都是由各民族区域的党政领导团体精心策划的。通过对动员性资源的垄断权进行分配，苏维埃联邦政治延缓了族群联邦主义的出现，但与此同时，它也暗藏了后来较发达族群共同体的地方干部动员他们自己的选民反抗莫斯科的可能性。通过对地方干部的策略选择进行限制，苏维埃联邦政治可能会使地方干部在对其选民进行动员时选择工具性的而非原发性的议程。但后来，在一些地区（最著名的即波罗的海三国），制度改革导致地方干部或权力新贵们的动机结构发生了改变，而从1990年1月起，族群自决主义的规格（magnitude）、形式（patterns）和议程安排（agendas）主要就是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的。<sup>86</sup>

在有些地区，政治制度既没有制造出垄断性的族群企业家，也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他们的策略选择，在这些地区，政治制度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分配动员资源和塑造族群策略的。<sup>87</sup>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事实。在一些共和国，地方干部由于丧失了对族群共同体的动员资源的垄断权，因此其对共同体的控制能力也就被削弱了。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和公开性（glasnost）的政策侵蚀了地方干部的能力，使其无法控制由他们所发动的抗议行动，也无法阻止自治取向的族群政治运动。随着他们的控制能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地方干部们的策略通常会发生改变。现在，在一些共和国中，地方干部会做出一些自我冲突的行为，他们会对由相互竞争的不同议程所代表的不同的精英和民众群体都进行动员，这些相互竞争的议程反映了对原发性诉求和工具性诉求的不同的平衡关系。<sup>88</sup>截至1990年初，这种自我冲突的行为已经导致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组织彻底分裂。另一派领袖宣布了竞争性的族群议程，而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党的资产都被分割了。<sup>89</sup>

在1990年1月前后，立陶宛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时性研究（diachronic study），它展示了苏维埃选举制度的改革如何使地方上的新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权力，并使族群议程的重点从工具性议题转移到原发性议题上来。Brazauskas的实用主义领导风格被兰茨贝吉斯所取代，后者立刻就强调关于主权的符号性议题，尽管这些议题并不包含真正的自治。在莫斯科的打压下，新的领导层很快就同意了所有的工具性议题都是可谈判的，但是原发性议题则不是——这些议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宣言。<sup>90</sup>由于苏维埃制度的改革并不是在所有共和国中均匀地进行的，因此，将1990年1月之后，立陶宛的情况与某些其它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就提供了关于制度改革的后果的横剖比较研究（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例如，在白俄罗斯，1990年初的选举没有为精英们提供开放的竞争机会，也没有使在野的政治企业家获得权力。白俄罗斯的政治议程仍然

<sup>84</sup>（原文脚注）Karl W. Deutsch已经注意到，在制度对族群态度（尤其是同化性）具有何种影响程度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差异。“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坚称，应将偏好具有“内生性”（“endogeneity” of preferences）当作更为普遍和一般的情况。例如，James P. March和Johan P. Olsen争论说，传统上，“政治理论把政治制度看作是决定性的、指令性的，或是能改变个人动机的。”

<sup>86</sup>（原文脚注）对于像兰茨贝吉斯和他的萨尤迪斯政府这样的新精英，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反应与苏维埃族群战略是相一致的，即强调用制度约束来影响族群议程。通过运用具有威慑性和强制力的约束条件，他试图诱使立陶宛政府放弃它的原发性议程，而是在苏维埃联邦政治的框架内追求体制改革的工具性目标。

<sup>87</sup>（原文脚注）Sidney Tarrow的研究描述了，在民主体制下，官僚体系同样塑造了地方领袖的策略，使其扮演了中央与外围之间的经纪人（brokers）的角色。

<sup>89</sup>（原文脚注）在立陶宛，当共和国的党政治局（republic Politburo）成员——例如萨尤迪斯政府的总理——意识到这些制度变革将对他们的权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他们也都开始退出共产党。



具有较多的工具性，并且拥护莫斯科的政策。因此，在莫斯科与萨迪尤斯政府对峙时期，白俄罗斯领导层宣布，如果立陶宛退出苏联而独立，它需要重新与之对二者的边界进行谈判。<sup>91</sup>

苏联在族群联邦政治上的经验表明，重新将制度因素吸收进族群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将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族群政治学分析框架包括：对苏维埃政体的研究、对列宁主义与非列宁主义政体的比较研究，或许还有对 1990 年之前与之后的苏维埃政体的比较研究。对苏维埃体制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可能就隐含在苏维埃联邦政治的诸项制度之中。特别地，苏联所选择的方向将取决于两方面能力的平衡，一方面是族群干部们在一个开放的竞技场上适应企业家角色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苏联的诸项制度将族群干部的策略选择限制在不会威胁苏维埃政治统一的限度之内的能力。

### 注释：

<sup>1</sup>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

<sup>2</sup> Sidney Verba, "Sequences and Development," in Leonard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3-316; Dankwart A. Rustow, *A World of Nation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1967), 120-32.

<sup>3</sup> 关于苏维埃发展战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也进行过类似论述；详见 Philip G. Roeder, "Moder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Leninist Developmental Strate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September 1989), 859-84.

<sup>4</sup> Rudolph and Thompson, "Ethnoterritor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ccommodating Nationalist Demand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s* 17 (April 1985), 292. See also 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147-78;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sup>5</sup> Gourevitch, "The Reemergence of 'Peripheral Nationalisms': Some Comparative Speculation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 (July 1979), 303-22, at 319-21. See also Donald L.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 165-95.

<sup>6</sup> William Bernard, "New Directions in Integration and Ethnic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 (Winter 1971), 464-73; Michael Hechter, Debra Friedman, and Malka Appelbaum, "A Theory of Ethnic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6 (Summer 1982), 412-34; Phillip M. Rawkins, "An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Welsh Nationalist Movement," *Political Studies* 27 (September 1979), 440-57; Joseph Roth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

<sup>7</sup> Smith, *The Ethnic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7, 126.

<sup>8</sup> Ibid., 105; James McKay, "An Exploratory Synthesis of Primordial and Mobilizationalist Approaches to Ethnic Phenomen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5 (October 1982), 395-420, at 399.

<sup>9</sup> Rothchild (fn. 6), 30.

<sup>10</sup> Glazer and Moyniha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7.

<sup>11</sup>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77), 27: 255.

<sup>12</sup> 1989 年 10 月，雅库塔 (Yakutia) 的 Even-Batagai 区成为了一个新的 (第 11 个) 自治区；*Pravda*, October 30, 1989. 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其他变化。

<sup>13</sup> Stalin, "The Policy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Russia," in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4: 370-71.

<sup>14</sup> Motyl, *Will the Non-Russians Rebel?*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4. See also Grey Hodnett, "The Debate over soviet Federalism," *Soviet Studies* 18 (April 1967), 458-81; Daniel C. Matuszewski, "Nationalities in the

- Soviet Future: Trends under Gorbachev,” in Lawrence C. Lerner and Donald W. Treadgold, eds.,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Futu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95-96.
- <sup>15</sup> Hodnett, *Leadership in the Soviet National Republics* (Oakville, Ontario: Mosaic Press, 1978), 101-3, 377-78; Jones and Grupp, “Modernisation and Ethnic Equalisation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36 (April 1984), 159-84, at 174; *Deputaty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odinadtsatiy sozyv* [Deputies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eleventh convocation] (Moscow: Izvestiia, 1984); Gavin Helf, comp.,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Soviet Regional Party Leaders*, 2d ed. (Munich: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1988). 关于在一些特殊的共和国内当地民族化的长期趋势这一问题, 参阅John A. Armstrong,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New York: Praeger, 1959), 15-17; Ronald Grigor Suny,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9-318;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Kazakhs*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s Press, 1987), 199-246. See also Steven L. burg, “Russians, Natives, and Jews in the Soviet Scientific Elite: Cadre Competition in Central Asia,”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20 (January-March 1979), 43-59; Nancy Lubin, “Assimilation and Reten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Uzbekistan,” *Asian Affairs* 12 (October 1981), 277-85, at 283; J. W. R. Parsons,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Soviet Georgia,” *Soviet Studies* 34 (October 1982), 547-69, at 554.
- <sup>16</sup>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Russia and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76; *Izvestiia*, July 14, 1989; *Kommunist Tadzhikistana*, June 28, 1989; *Pravda*, June 25, 1988.
- <sup>17</sup> Alex Inkeles, *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 A Study in Mass Persua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up>18</sup>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16. See also Motyl (fn. 14), 104-5, 119-22.
- <sup>19</sup> Donna Bahry, *Outside Moscow: Power, Politics, and Budgetary Policy in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10-17.
- <sup>20</sup> Ro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3 (May-June 1974), 1-22, at 13.
- <sup>21</sup> Parsons (fn. 15), 558-59.
- <sup>22</sup> Lubin (fn. 15), 283.
- <sup>23</sup> Mark Popovsky, *Manipulated Scienc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9), 118.
- <sup>24</sup> John Soper, “Nationality Issues under Review in Kirgizia,”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49/88 (January 29, 1988).
- <sup>25</sup> USSR Tsentral' noe Statisticheskoe Upravlenie, *Narodnoe obrazovanie, nauka I kul'tura v SSSR* [Popular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USSR] (Moscow: Statistika, 1977), 308-39.
- <sup>26</sup> See, for example, Dietrich A. Loeber,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e in Soviet Latvia,” in Adolf Sprudz and Armin Ruis, eds., *Res Baltica* (Leiden: A. W. Sijthoff, 1968, 133-45); Nicholas P.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50-51.
- <sup>27</sup> Timur Kocaoglu, “Muslim Chain Letters in Central Asia,”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313/83 (August 18, 1983); Alexandre Bennigsen, “Mullahs, Mujahidin, and Soviet Muslims,” *Problems of Communism* 33 (November-December 1984), 28-41, at 36-37.
- <sup>28</sup> Ludmilla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1.
- <sup>29</sup> Bennigsen (fn. 27), 40.
- <sup>30</sup>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88, November 26, 1988, December 22, 1988, January 2, 1989. See also *Pravda*, January 26, 1990.
- <sup>31</sup> Michael Rywkin, *Moscow's Muslim Challenge*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2), 121; B. Brown, “Kazakhstan in

- 1987: The Year after Alma Ata,”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5/88 (December 23, 1987), 2. See also Ronald Grigor Suny, *Arme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o, Calif.: Scholars Press, 1983), 78-80.
- <sup>32</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89; see also June 20, 1988, August 24, 1988, August 25, 1988, October 10, 1988, November 30, 1988, December 2, 1988, December 7, 1988, February 5, 1989, April 9, 1989, April 14, 1989, April 22, 1989; Bohdan Nahaylo, “Baltic Echoes in the Ukraine,” *Report on the USSR* 1 (January 13, 1989), 18-20; idem, “Confrontation over Creation of Ukrainian ‘Popular Front,’” *Report on the USSR* 1 (March 3, 1989), 13-17.
- <sup>33</sup> *Tygodnik Powszechny*, February 5, 1989. See also *Izvestiia*, May 15, 1989; *Saulius girnius*, “Unofficial Groups in the Baltic Republics and Access to the Mass Media,” *Report on the USSR* 1 (May 5, 1989), 16-19.
- <sup>34</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90, March 6, 1990, March 31, 1990.
- <sup>35</sup> Moscow TASS, November 20, 1988, reported in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vember 21, 1988, pp. 42-43;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88, November 27, 1988, December 8, 1988, May 19, 1989, May 25, 1989.
- <sup>36</sup> *Kommunist* (Baku), October 14, 1988; *Izvestiia*, January 5, 1989.
- <sup>37</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89; Vladimir Socor, “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Question Heating Up in Soviet Moldavia,” *Report on the USSR* 1 (September 8, 1989), 33-36; *Pravda* July 29, 1989.
- <sup>38</sup> See, for example,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43/88 (January 29, 1988), 5, RL 167/88 (April 15, 1988), 9, RL 177/88 (April 22, 1988), 10, RL 258/88 (June 17, 1988), 7; *Report on the USSR* 1 (May 19, 1989), 33.
- <sup>39</sup> H. Gordon Skilling, “Group Conflict in Soviet Politics: Some Conclusions,” in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i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399-405; Robert E. Blackwell, Jr., “Cadres Policy in the Brezhnev Era,” *Problems of Communism* 28 (March-April 1979), 29-42.
- <sup>40</sup> Grey Hodnett, *Leaders of the Soviet Republics, 1955-1972*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y of Soviet Officials: Republic Organizations* (Washington, D. 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80); Hodnett (fn. 15), 63-65.
- <sup>41</sup> Mark Beissinger, “Ethnicity, the Personnel Weapon, and Neo-Imperial Integration: Ukrainian and R.S.F.S.R. Provincial Party Officials Compar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1 (spring 1988), 71-85; Patrick Cockburn, “Dateline USSR: Ethnic Tremors,” *Foreign Policy* 74 (Spring 1989), 174-75; Suny (fn. 15), 301-5; Suny (fn. 15) 73-75; Joel Moses, “Regionalism in Soviet Politics: Continuity as a Source of Change, 1953-82,” *Soviet Studies* 37 (April 1985), 184-211; Martha Brill Olcott, “Gorbachev’s Nationalities Policy and Soviet Central Asia,” in Rajan Menon and Daniel N. Nelson, eds., *Limits to Soviet Power*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9), 77-81.
- <sup>42</sup> See Bahry (fn. 19), 2-3, 25-31, 77-85; Steven L. Burg, “Muslim Cadres and Soviet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37 (October 1984), 24-47, at 33, 36.
- <sup>43</sup> USSR (fn. 25) 308-9.
- <sup>44</sup> Ellen Jones and Fred W. Grupp, “Measuring Nationality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search Note,” *Slavic Review* 41 (Spring 1982), 112-22. 这并不是说均等化 (equalization) 导致了完全平等 (equality) 甚至地位颠倒, 参阅 Rakowska-Harmstone (fn. 20), 12; Peter R. Zwick,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in Gordon B. Smith, ed.,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80), 159. 并且, 如图 2 所示, 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延缓 (但并未阻止) 了这一均等化过程 (leveling process)。
- <sup>45</sup> *Pravda*, October 29, 1988.
- <sup>46</sup> Martin Spechle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1958-1978,” in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145. See also Donna Bahry and Carol Nechemias, “Half Full or Half Empty? The Debate over Soviet Regional Inequality,” *Slavic Review* 40 (Fall 1981), 96; Elizabeth Clayton, “Regi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ACES Bulletin* 17 (Winter 1975), 35-43; James W. Gillula,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f Soviet Republics,” in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629; Gertrude Schroeder, “Soviet Regional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in *The USSR in the 1980’s*

- (Brussels: NATO Direction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131; Brian Silver, "Levels of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among Soviet Nationalities: A Partial Test of the Equalization Hypo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December 1974), 1637.
- <sup>47</sup> William Korey, "The Legal Position of Soviet Jewry: A Historical Enquiry,"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94-95; Alec Nove and J. A. Newth, "The Jewish Population: Demographic Trends and Occupational Patterns," in Kochan, 147.
- <sup>48</sup> Lubin (fn. 15), 228, 283-84.
- <sup>49</sup> Popovsky (fn. 23), 138.
- <sup>50</sup> Moscow Television, November 26, 1988, reported in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vember 28, 1988, p. 50. See also James Critchlow, "How Solid is Uzbekistan's Support for Moscow?" *Report on the USSR* 1 (February 10, 1989), 7.
- <sup>51</sup> See also Philip G. Roeder, "Electoral Avoidance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Studies* 41 (July 1989), 478-80.
- <sup>52</su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1989; see also March 25, 1988; *Pravda*, November 2, 1988; *Sovetskaia Estoniia*, November 29, 1988.
- <sup>53</sup> Moscow TASS, November 20, 1988, reported in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vember 21, 1988, pp. 42-43;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88, November 27, 1988, December 8, 1988, May 19, 1989, May 25, 1989.
- <sup>54</sup> *Izvestiia*, September 11, 1988, August 3, 1989, August 15, 1989; *Sovetskaia Industriia*, March 2, 1989; *Sovetskaia Litva*, October 7, 1988. See also *Izvestiia*, May 19, 1989; *Sovetskaia Litva*, May 19, 1989; *Pravda*, July 30, 1989; Dzintra Bungis, "A Comparison of the Baltic Declarations of Sovereignty," *Report on the USSR* 1 (September 15, 1989), 13-16; Kestutis Girmius, "The Lithuanian Communist Party and Calls for Sovereignty," *Report on the USSR* 1 (February 17, 1989), 18-20.
- <sup>55</sup> *Pravda*, January 25, 1989.
- <sup>56</sup> *Izvestiia*, September 7, 1989, November 14, 1989; *Literaturnaia Gazeta*, March 9, 1988. See also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89, April 9, 1989, April 16, 1989, August 7, 1989; and the interview with G. A. Pogosyan of the Nagornyi Karabakh, ArmenPress Internatioanl Service, August 16, 1988, reported in FBIS,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August 23, 1988, p.43.
- <sup>57</sup> *Pravda*, July 20, 1988.
- <sup>58</sup> 1989年12月1日, 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委员会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 将纳卡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 *Kommunist* [Erevan], December 3, 1989.
- <sup>59</sup> *Bakinskii Rabochii*, March 11, 1988; *Izvestiia*, March 25, 1988; *Krasnaia Zvezda*, February 28, 1989; *Moskovskie Novosti*, March 20, 1988; Roman Solchanyk and Ann Sheehy, "Kapitonov on Nationality Problems in Georgia,"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125/78 (June 1, 1978), 1-5; Elizabeth Fuller, "How serious are Inter-Nationality Tensions in Georgia?"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444/83 (November 25, 1983), 1-9; idem, "Abkhaz-Georgian Relations Remain Strained," *Report on the USSR* 1 (March 10, 1989), 25-27; Rasma Karklins, "Ethnic Politics an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The Soviet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April 1984), 277-94, at 278.
- <sup>60</sup> Brown (fn. 31), 1-4.
- <sup>61</sup> I. D. Koval'chenko et al., "Natsional'nye protsessy v SSSR—itogi, tendentsii, problemy" [National processes in the USSR: Results, tendencies, problems], *Istoriia SSSR* (November-December 1987), 5-120, at 63, 73, 74, 79-80. See also Erwin H. Epstein, "Ideological Factors in Soviet Educational Policy towards Jews,"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10 (February 1978), 227-28; Rasma Karkli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SSR*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6), 142, 146, 219.
- <sup>62</sup> V. Kobakhia, Pis'mo [Letter], *Argumenty I fakty* (October 7-13, 1989), 8.
- <sup>63</sup> Suny, "Georgia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ty," in Stephen F. Cohen, Alexander Rabinowitz, and Robert Sharlet, eds., *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13, 219. See also *Izvestiia*, February 25,

- 1989; Charles E. Ziegler, "Nationalism, Religion and Equality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viet Case,"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3 (Summer 1985), 9-32, at 27.
- <sup>64</sup> *Izvestiia*, March 17, 1989. See also *Izvestiia*, March 10, 1989, August 31, 1989; *Pravda*, August 17, 1989; *Sovetskaia Litva*, February 14, 1989; Karklins (fn.59), 290-91; Roman Solchanyk, "Russian Language and Soviet Politics," *Soviet Studies* 34 (January 1982), 23-42;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88, June 22, 1988, July 23, 1988, September 2, 1988, January 19, 1989, July 27, 1989, July 28, 1989, August 7, 1989.
- <sup>65</sup> Suny (fn. 63), 213; Juris Dreifelds, "Latvian National Demands and Group Consciousness since 1959," in George Simmonds, ed.,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ra of Brezhnev and Kosygin* (Detroit: University of Detroit Press, 1977), 136-56; Jaan Pennar,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Baltics," in Erich Goldhagen, e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68), 206. See also *Pravda*, March 1, 1989.
- <sup>66</sup> *Pravda*, July 29, 1989, August 10, 1989. See also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88, June 22, 1988, June 23, 1988. 在此项立法被全联盟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宣布无效后，爱沙尼亚又实施了一项新立法，要求所有申请共和国的职位的候选人必需已经在爱沙尼亚居住了至少 10 年； *Pravda*, November 18, 1989.
- <sup>67</sup> *Izvestiia*, June 9, 1989, June 10, 1989, June 20, 1989, June 23, 1989, December 1, 1989; *Pravda*, June 5, 1989, June 6, 1989, June 7, 1989, June 10, 1989, June 12, 1989, June 20, 1989, June 25, 1989, January 17, 1990; Annette Bohr, "Violence Erupts in Uzbekistan," *Report on the USSR* 1 (June 16, 1989), 23-25; Ann Sheehy, "Interethnic Disturbances in Western Kazakhstan," *Report on the USSR* 1 (July 7, 1989), 11-14.
- <sup>68</sup> 有些人认为，党领导层煽动暴力冲突的动机是为进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但事实并非如此；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1990. See also *Izvestiia*, January 15, 1990, January 16, 1990.
- <sup>69</sup> *Report on the USSR* 1 (January 27, 1989), 29.
- <sup>70</sup> *Pravda*, January 13, 1988, May 21, 1988, June 17, 1988, October 5, 1988, October 21, 1988, April 15, 1989, June 23, 1989, June 24, 1989, September 29, 1989, November 17, 1989.
- <sup>71</sup> *Izvestiia*, March 17, 1989, May 25, 1989, August 23, 1989; *Pravda*, July 29, 1989, August 10, 1989, August 11, 1989, August 23, 1989, August 25, 1989, September 5, 1989; *Sovetskaia Estoniia*, March 1, 1989, March 7, 1989.
- <sup>72</sup> *Izvestiia*, July 13, 1989; *Komsomol'skaia Pravda*, March 3, 1989; *Sovetskaia Litva*, February 25, 1989.
- <sup>73</sup> Quoted in Cockburn (fn. 41), 178.
- <sup>74</sup> See *Pravda*, April 9, 1989, August 23, 1989, August 24, 1989, September 10, 1989, February 2, 1990; *Zaria Vostoka*, April 12, 1989, April 14, 1989;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1989, August 29, 1989, August 30, 1989, September 1, 1989, September 17, 1989; Saulius Girnius, " 'Sajudis' Parliament Statement on Independence," *Report on the USSR* 1 (September 15, 1989), 17-18.
- <sup>75</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 <sup>76</sup> Smith (fn. 7), 105. See also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24 (April 1972), 319-55; Milton Esman, e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Worl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105-57; 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June 1957), 130-45.
- <sup>77</sup> Crawford Young,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lur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6), 43. See also Frederic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Glazer and Moynihan (fn. 10); Robert Melson and Howard Wolpe, *Nigeria: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alis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71); Ronald Rogowski, "Causes and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 A Rationalist Account," in Edward A. Tiryakian and Ronald Rogowski, eds., *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5), 87-108.
- <sup>78</sup> Arend Lijphart, "Political Theori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Ethnic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Esman (fn. 76),

46-64.

- <sup>79</sup>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he Soviet Union," in Robert G. Wirsing, ed., *Prote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127. For a fine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is approach, see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soviet Case," *World Politics* 36 (July 1984), 555-80.
- <sup>80</sup> Karpat, "Moscow and the 'Muslim Ques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32 (November-December 1983), 79.
- <sup>81</sup> Bennigsen and Wimbush, *Muslims of the Soviet Empire* (London: C. Hurst, 1985), 3, 31.
- <sup>82</sup> 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 族群领袖们的族群自决主义可以看作是这些地区已经具有相对程度的族群意识 (relative levels of ethnic awareness) 的证据。通过强调这一点, 这一范式似乎可以获得“拯救”。然而, 在这个意义上, 相对程度的民族意识 (relative leve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这一概念并不是族群问题政治化的预测变量, 也不能与之构成因果关系, 相反, 它只是一种描述或定义。
- <sup>83</sup> Suny (fn. 63), 220. 在许多西方社会, 事情同样如此; 参阅Anthony Mughan, "Moder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elgium," *Political Studies* 27 (March 1979), 21-37; Rogowski, "Conclusion," in Tiryakian and Rogowski (fn. 77), 374-76.
- <sup>84</sup> Karl W. Deutsch已经注意到, 在制度对族群态度 (尤其是同化性) 具有何种影响程度这一问题上, 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差异; 参阅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roblems of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4), 33, 39-40. “新制度主义 (new institutionalism)” 坚称, 应将偏好具有“内生性” (“endogeneity” of preferences) 当作更为普遍和一般的情况。例如, James P. March和Johan P. Olsen争论说, 传统上, “政治理论把政治制度看作是决定性的、指令性的, 或是能改变个人动机的。” 参阅 March and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4-7, 154-56. 关于其他促使族群精英倾向于对族际暴力冲突进行控制的动机, 参阅Eric A. Nor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2).
- <sup>85</sup> Illustrations of this approach include Edward Allworth, "Restating the Soviet Nationality Question," in Allworth, ed., *soviet Nationality Probl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78); Rakowska-Harmstone (fn. 79).
- <sup>86</sup> 对于像兰茨伯吉斯和他的萨尤迪斯政府这样的新精英,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反应与苏维埃族群战略是相一致的, 即强调用制度约束来影响族群议程。通过运用具有威慑性和强制力的约束条件, 他试图诱使立陶宛政府放弃它的原发性议程, 而是在苏维埃联邦政治的框架内追求体制改革的工具性目标。
- <sup>87</sup> Sidney Tarrow的研究描述了, 在民主体制下, 官僚体系同样塑造了地方领袖的策略, 使其扮演了中央与外围之间的经纪人 (brokers) 的角色; 参阅Tarrow,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8, 43-44.
- <sup>88</sup> *Sovetskaia Latvija*, March 19, 1989.
- <sup>89</sup> *Pravda*, February 8, 1990, February 9, 1990;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90. 在立陶宛, 当共和国的党政治局 (republic Politburo) 成员——例如萨尤迪斯政府的总理——意识到这些制度变革将对他们的权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 他们也都开始退出共产党。
- <sup>90</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1990.
- <sup>91</sup>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90, March 6, 1990, March 31, 1990.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 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于长江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